

立新

MAKE A DIFFERENCE

创刊号

立新
MAKE A DIFFERENCE

编辑委员会
Editorial Board

顾问：张盛闻上议员
Adviser: YB Senator CHONG Sin Woon

主编：李锡锐
Chief Editor: LEE Sek Yui

编委 Editors:
甘德政 KAM De Zheng
李荣健 LEE Weng Ken
吴文发 GOH Boon Huat
张以勒 Musa Ile CHONG

制作：黄宇琛
Typesetting: WONG Yee Chen

马华公会青年团出版
Published by MCA National Youth



Wisma MCA (Tingkat 7),
163,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Pemuda MCA Kebangsaan

本刊版权为马华公会青年团拥有，如欲转载、翻译或收集本刊文字或图片，必须先获得本刊书面许可。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目录 Contents

拿督斯里廖中莱 Y.B. Dato' Sri LIOW Tiong Lai	马华总会长献词 Message from MCA President	04
张盛闻上议员 Y.B. Senator CHONG Sin Woon	马青总团长发刊词 Message from MCA National Youth Chairman	05
李锡锐 LEE Sek Yui	卷首语 Foreword	06
吴健南 NG Kian Nam	马华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的反思 Reflections on MCA Political Course and Ideology	07
甘德政 KAM De Zheng	陈祯禄政治理念的形成与论述 The Political Ideals of Tan Cheng Lock	14
李荣健 LEE Weng Ken	政治意识形态的简介与讨论 Introduction and Discussion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19
广招党员运动委员会编 MCA Recruitment Drive Committee	马华的基本路线 MCA's Fundamental Path	28
马华中央干训局 MCA Cadre Training Bureau	马华公会的政治哲学、目标和路线 MCA's Political Philosophy, Objectives & Direction	35
张文欢 TEOH Boon Hwai	马华该走何种斗争路线? MCA Which Political Path to Take?	39
潘永强 PHOON Wing Keong	没有“主义”的保守 Being Conservative without Conservatism	47
潘永强 PHOON Wing Keong	马华应朝理想的保守政党转型 MCA Should Transform into a Conservative Party	53
郑丁贤 TAY Tian Yan	恶水上建桥 MCA in Dire Need of a Rebirth	56



2007年的马青第44届全国年度代表大会，当时的马青总团长拿督斯里廖中莱发表《回到建国之本，维护宪法精神》时摄。

献词·马华总会长

拿督斯里廖中莱

马青总团即将出版《立新》期刊，开拓一个以思想激荡与理性论政的平台，本人深感欣慰。

在2007年8月18日，第44届马青全国代表大会，本人强调“在政治上，关系民族利益的课题，马青的立场绝对鲜明，不回避、不挑衅，咬定青山不放松。马青不只敢怒敢言、敢做敢当，同时也做到有勇有谋、有情有义，进可攻、退可取。”虽然如此，马青作为马华的先锋，绝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一个有担当、有泱泱大气的马青，是诉诸于理性，而不是诉诸于情绪。

与此同时，本人也期望马青作为一股年青的力量，能够继续接触及吸引年轻人，投入母体的改革，展现年轻人的壮志豪情与气魄。目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严峻的政治格局，马青干部和团员，必须秉持无比坚毅的意志，突破旧政治

框框，协助党团在危机中振奋，竖立新时代面貌，以让马华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

马华的改革转型，是传承马华建设民主、自由、公平社会的创党宗旨，致力于重建马华当家当权的政治定位，通过全方位的自我革新、自我强化、自我改造，恢复马华的政治格局，以更强大坚实的政治力量，引领华人社会继续参与国家建设，为马华赢回尊严，走出一条新路。

马华今天已经迈入改革之路，如何把马华转型为现代化政党，迎合时代的变迁，是刻不容缓的大事。因此，本人呼吁马青同志们集思广益、众志成城，积极落实党的改革计划，打造属于你们的未来。

立新



2014年的马青第50届全国年度代表大会，马青总团长张盛闻发表《立足未来·莫忘初衷》时摄。

发刊词·马青总团长

张盛闻

马青作为马华的先锋，配合母体改革，是义不容辞的担当。因此，在这新时代，如何走出一条新路，如何突破目前的政治框框，如何打破现在的政治枷锁，重整我党威望，已经是迫不及待的大事。

我们相信党进行改革，绝对不纯粹是口号的呐喊，而必须通过每一个同志的热烈参与，才能为改革奠下稳固的基础。所以，我们设立这个论政平台，大家齐聚一堂，采取“百家争鸣”自由开放的姿态，打造思维激荡的火焰，进而引发同志们更全面的思考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乃至开拓更宽广的视野，提升同志们参政的热情与素质，为马华开拓一条康庄大道。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珍惜同志的每一分力量、每一把声音，我们也诚恳的、谦卑的欢迎社会的批判，

且让我们把这些“星星之火”聚集起来，用我们的沸腾的热血、理性的论证，点燃我党“浴火重生”的万丈火焰。

作为一个开端，我主张回到最初，从马华创党开始，究竟当年敦陈祯禄，带领马华走的是什么路线？而党经过一甲子的浮沉、六十年的跌宕，也是时候告别传统政治的威权与教条，一面抛弃腐朽与僵硬的政治观念，一面综合先辈们优良的智慧，以破旧立新、去芜存菁的新态度、新格局，树立新时代精神、适应新社会环境。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让我们从探讨“马华的政治路线”为一个起点，大家集思广益、整顿出发，为党团掀开新的一页、打造一个新的里程碑。

立新

卷首语

《立新》采纳“百家争鸣”与“兼听则明”的编辑方向，每期设定一个专题并刊登相关的文章和邀请不同的作者，就此专题作出深入的探讨。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本刊编委会的立场，所刊登的文章字数多寡不一，行文风格不尽一致，但编委会只是进行技术性的改动，不作内容删改，务求让读者通过多元的视角与叙述，对有关专题获得一个更完整的认知。

本刊第一期专题是“马华的政治路线”。吴健南律师以〈马华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的反思〉为题，尝试以宏观的角度，分析马华创党至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并期望能够引起更多的探讨和探索，丰富马华的政治内涵。甘德政博士则从〈陈祯禄政治理念的形成与论述〉细腻的叙述敦陈祯禄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大时代下，形成其政治主张与理念。敦陈祯禄为大马华人公民的奠基者，亦是倡议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团结和谐的政治先知先觉者，其理念依然有跨时代的意义。当我们探讨马华的政治路线，不能忽略敦陈祯禄政治理念的价值。虽然如此，我们也必须重视时代的变迁，具体探讨当代政治潮流的趋向，以研究马华适合何种现代政党模式的转型。因此，李荣健先生以〈政治意识形态的简介与讨论〉深入浅出、简明清晰地介绍当代欧美政党路线的取向与各种政党路线的差异，提升我们这方面的思考。

本刊也从马华现有的文献，编入两篇相关的文章，分别是〈马华的基本路线〉和〈马华公会的政治哲学、目标和路线〉，让大家了解马华过去的政治路线。此外，本刊也收录了四篇从不同角度，讨论马华的文章。张文欢先生在〈马华该走何种斗争路线〉分析马华的政

治情况和路线，而潘永强博士的〈没有“主义”的保守〉和〈马华应朝理想的保守政党转型〉分别阐明马华与保守主义的关系，并归纳总结马华朝向保守主义政党的可行性。假设以上文章都是长文——“苦药”，那郑丁贤先生的〈恶水上建桥〉则是“糖衣”，其文虽短，但字字铿锵、言之凿凿、叙述畅快、主题明确，适合大家再三细读。

这次编委会邀请三位作者提供讨论专题的文章，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期待更多有识之士供稿、发表意见或参与讨论，拟定未来的专题。

编委会在遴选文章方面，相信有“沧海遗珠”的现象。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既是一边学习，又一边修整。因此恳请党内外朋友指正，以便加以改订。

最后，编委会要感谢诸位直接或间接协助本刊顺利出版的同志和朋友，本刊如有任何错处或遗漏，都是本人力有不逮，还盼诸位包涵。

主编

立新



李锡锐，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硕士、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士。曾任马青总团宣传局秘书、马青总团出版局主任等职，曾为马青编辑《马青五十年风雨路（1955-2005）纪念画册》（2005）、《铁胆雄心——马来西亚华裔警察故事》（2007）、《回首——马青53年风雨路》（2008）、《2009年国庆日爱国漫画比赛作品集》（2009）等等。

马华公会作为1950年代其中一个独立建国功臣和至今仍然屹立不倒的执政成员党，无可否认，该政党累积了一套异常丰富和充实的党组织运作和执政经验。

问题是，或许由于长期处于安逸的掌权状态并依附在国阵老大哥巫统的领导下，马华除了于早年陈祯禄创党时代因为要回应马共来势汹汹的攻势和英殖民地政府的各种挑战，而提出一些比较鲜明和宏观的政治路线和主张以争取华裔在本土的公民与参政权以外，后来的大部分阶段都只是采取稳打稳扎的务实态度迈步向前。

所以相对其国内的在野党政敌，如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行动党，或坚持神权治国主义的伊斯兰党；或于上个世纪国际舞台以美国民主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两强对立的冷战时期，马华的政治路线似乎较为模糊，予人没有清晰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等内涵的印象。

无论如何，虽然马华并没有像一些政党把本身的意识形态明确地列入党章，但是综合该党党章、党史和政绩，尤其通过历任领导层在各个重要事迹和年代的应对方式和领导模式，我认为还是可以为该党梳理出一套较为清晰的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

纯华人政党特质 符合民族主义

首先马华给大家最强烈的特色，无疑是作为大马独一无二的纯华人政党。这就像其国阵其它也是作为建国功臣同



马华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的反思

吴健南，马来亚大学法学系荣誉学士。执业律师、时事评论人和星洲日报专栏作者、全国马青中委和策略局主任。曾任马华智囊团策略研究员、房政部长新闻秘书。

僚的巫统代表国内马来人，以及印度国大党代表国内印裔的情况一样，可说是大马独立建国时代的特殊历史产物。国内的社团注册局往后也不太可能会再允许类似以种族或宗教为主的政党设立。当然，在野党的伊斯兰党也同样享有这个例外，获准以一个垄断有关宗教代表权的政党名字被注册。

这鲜明的种族路线也同样贯彻在马华的入党资格里。根据该党党章第9条款，首先其申请者必需是马来西亚华裔公民。一旦你先天并非华裔，没有华人血统，都将被拒于门外。由此可见，马华与大马华裔的关系是密不可分、水乳交融的。与其说是马华领导华社，更贴切的说法应是马华来自华社。

这一点从马华在大马政坛落地生根那一刻即已获得印证。马华于1949年成立初期，性质上本是福利组织，跟其它

当时的华团如中华大会堂、中华商会和乡团等一样是个非政府组织。而当时因为紧急法令的颁布和马来亚联合邦宪制所间接催生的马华，也获得后者的普遍热烈欢迎和支持。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更是当年马华召开成立大会的历史标杆所在地。

随后立党至今，马华始终坚持在以大马华裔作为本位主义的路线，包括在陈祯禄时代呼吁当时南来的华侨放弃回中国或投机性的双国籍念头，在大马落地生根争取本身的公民和参政权；在林苍佑时代为马华向国父东姑争取更多符合华裔人口比例的3份1上阵议席；在李三春时代推动华人自强运动，通过合作社计划开拓华裔的经济发展潜能和空间。

从此角度而言，马华无疑含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相关的政治学者雷嘉（Morstafa Rejai）就将“民族”界定为人数相当多的一群人，由于具有诸如同种、同文、同文化、共同的历史、共同的一套习惯或传统等类似特性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性，因而具有共同的归属感。而普莱士（James Bryce）则认为，民族主义乃一个民族乃至一大群人口，由于语言文学、风俗习惯，以及各项传统的种种维系，而团结在一起，自己觉得构成一个有系统的统一单位，而有些于其他同样受着种种类似维系的许多群体。

所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指一种心态，亦即一个人以民族作为最高效忠对象的心理状态。民族主

义包含着自民族优于其他民族的信仰，而且视民族比个人重要。这在回教世界或阿拉伯民族，表现得更为明确。而且民族主义含有秘思的成分，秘思即普遍流行的信仰和情感体系，而中国人有“龙的传人”秘思，犹太人有“上帝的选民”秘思，伊斯兰教则有“为真主牺牲斗争”的秘思，这虽然是自古流传，但迄今在国内外仍有影响力。

成功族群协商政体， 缓和国内族群冲突

无论如何，必须阐明的，并非所有的民族主义皆是如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或部分伊斯兰极端分子如IS或塔利班般极端、激进和付诸于暴力的。也就是先知先觉意识到在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过于强调民族主义易于造成冲突，如俄国因车臣要求独立爆发内战、中国的西藏要求独立受到压制、台海两岸的长期对立僵局等，马华早于1952年便与巫统首次合作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并获得大胜，奠下了随后进一步与印度国大党合组联盟（国阵的前身）成功向英殖民地政府争取独立的重大基础。

因此从当时联盟旗帜下巫统代表巫裔、马华代表华裔以及印度国大党代表印裔的运作模式不难发现，虽然有关3个成员党各自以本身族群出发，但却没有通过极端的对立方式相互抗衡，反而通过和谐和中庸的方式互相合作，把各自族群所面对的问题带到谈判桌，通过成熟和理性的方式协商以达致双赢局

面。

于1971年陈修信领导末期，马华也曾经推行华人大团结运动，主张作为国内少数族群的华裔本身必需凝聚内部力量，才能进一步达致国家大团结。这显示马华所推崇的民族主义并非极端并含有强烈的排他性，而是温和且能够兼容其他族群共存共荣的。

国阵的这套成熟的族群合作模式，虽然并非一帆风顺，尤其在1969年的513种族暴动更是留下历史污点，但整体而言还是成功带领大马从1950年代的落后农业国发展至目前以工商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也是在东南亚区域里继新加坡以外相对发展迅速和稳定的国家之一。国阵的这项成就，也一度成为许多多元族群国家所竞相参考和学习的对象。

例如研究种族政治的近代政治学者霍若维兹（Donald L. Horowitz）就给于国阵的种族协商模式给予高度肯定。他认为，不同的种族性政党体系，对于各国国内的族群关系会造成不一样的影响。而在这方面，他认为圭亚那和斯里兰卡的族群行政体系激化了这两国原本并为十分严重的族群冲突。反之马来西亚的体系则有缓和原本相当艰巨的族群冲突局面之作用。

在马哈迪领导的强人时代，他甚至一度有意把国阵的成熟模式升华到另一更高境界，从现有的各族分而治之进化为国族状态，也就是摒弃各族的差异、塑造一个大马国族。这跟如今的首相纳吉所主张的“一个大马”精神其实拥有

异曲同工之处。可惜，这个大马国族主张立意虽然良好，但却引起各族的强烈反弹，显然的大家都还未做好相关的思想建设和准备。

作为国阵的一分子， 推崇孔子的中庸之道

提到上述的国阵中庸精神，当然不得不提中华文化儒家祖师孔子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可以发现，马华的政治路线不只以大马华裔为出发点，且也继承了5千年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精髓，除了积极捍卫和发扬华语和华文的学习和传承以外，在处理和应对许多涉及族群争议的课题方面，也贯彻了相关的中庸精神。

在这方面其中一个正面典范不得不提创党元老陈祯禄。虽然本身乃出身自英文教育源流的峇峇后裔，并通过英文著作了解中华文化，但陈祯禄对华文和华教的热爱却赢得许多华教斗士的赞许，更有国内学者包括郑良树认为他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了解及贯彻，在马华历来的领袖中恐怕无人可出其右。但更难得的，即便如此，而且曾经反对巫统所提倡的马来亚联合邦宪制，尤其坚持放宽当局对当时华裔所制定的过于严厉公民权申请资格，但陈祯禄还是成功赢得巫裔社会包括巫统的认可和尊重，甚至被国父东姑赞许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建国功臣。

另一个把中庸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的马华领导人则是林良实。作为在位最

久的马华总会长，林良实的其中一个名言：“话到唇边留半句”充分反映其沉稳和内敛作风，也是确保其多番面对来自党内外挑战，包括成功收拾陈群川当年被判监禁后的24家华资合作社被冻结的烂摊子、马哈迪与东姑拉沙里在巫统的内斗、茅草行动风波、安华被革除副首相职务、李金狮的三打三不打，以及双林党争后，始终得以化险为夷的关键所在。他也成功在马哈迪调整路线实行小开放政策的1990年代推行了各项利民政策，包括增设拉曼学院分院、推动浮罗交怡教育振兴计划、华人思想兴革运动、开办拉曼大学等，并带领马华在1995和1999年大选取得辉煌胜利，使该党得以经历了一段长期的稳定和鼎盛时期。

遗憾的是，近年来尤其是经历了308和505大选以后，国阵的这套中庸精神如今已面临严峻考验，尤其某些极端份子为了保住本身政权，竟然迷失了方向也背叛了本身的国阵成员党同僚，选择付诸于最危险犹如玩火式的极端民族主义路线，提出各种违背联邦宪法精神和伤害其他族群情绪的的极端言论和施政主张，把多年来走在开明发展正轨的大马带到濒临神权治国的悬崖。

在历史上，左派与右派都曾有极端主义的出现，造成人世间的悲剧与惨剧。而极端主义的出现，主要是某一阶级，如劳工阶级或中上阶级的经济利益受威胁，在心理上没有安全感所致。因此，要迈向自由民主，防止极端主义的出现，必须创造与维持庞大而稳定的中

产阶级。

25名来自马来社会精英分子最近写给大马人的一封公开信，就是上述所谓中产阶级的一部分。由于已对极端分子的张牙舞爪和过分举措感到厌恶，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唤起各族国人对中庸精神的热切支持和期许，尤其通过沉默的大多数的力量复兴大马的特殊中庸精神。这证明马华和国阵所一直以来主张的中庸治国精神，乃有效管理这个多元社会的不二法门，也是战胜极端主义的唯一良药。

拒绝极端路线，奉行循序渐进的新保守主义

当然，马华的这种中庸路线，从西方的现代政治学角度而言，也可被诠释为保守主义的贯彻。当然，必需阐明的，所谓的保守主义在政治学里蕴含着本身的一套丰富历史背景和哲理，并非我们通俗认知里所谓的负面想法，把保守主义认定为抗拒改变的老古板或老古董。这种片面看法若可以成立的话，来自英美和欧洲的许多奉行保守主义的政党，如今不都已走入历史，或早被人民所唾弃？

事实上，在历史进程里，有好几种保守主义的存在。其中政治家柏克所论述的保守主义，以他对周遭变迁的回应为基础。他看到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改变，也厌恶这种改变。他看见了中产阶级在要求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上的野心，他不喜欢这种争权夺利的现象。他

相信，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社会和政治体系的进化。这些体系只是随时间而演进。在每一特定时刻，社会总是美好的，因为社会已经发展，而且这种发展或许可能被认为是这个社会上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所谓最优良的社会或最优良的政治体系。

根据柏克的见解，这正是改革家或激进分子易犯错误之处，因为既然无人能了解社会或文化的演进原因，那么也不应有人企图改变社会或文化。改变的尝试只会导致经年累月交织成的社会结构被连根拔起。

当然，这不是说传统主义者反对一切改变。柏克认为，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体系经过一段时期，就会进化。他往往反对个人或团体为中心预设的终极价值诸如自由平等而做出变革。

虽然在这个民主和自由主义抬头的年代，保守主义的前景看似不容乐观，但事实正好相反。尤其近年来在美国更为如此，出现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团体，象征着柏克所提倡的保守主义获得显著复兴。

这个团体源自一群很有意思的人士-幻梦觉醒的自由派与左派人士。诚如新保守主义作家克里士多（Irving Kristol）所论述的，新保守主义是被现实打击的自由主义者。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宣称，他们实际上仍忠于现代自由主义，只是美国民主党已太左倾，以致对于国内改革与和平主义外交政策，具有不切实际的观念。因此，这些新保守主义者一如古典保守主义之父柏克，实际

上并不保守。

柏克警觉到自由主义过于相信人的理智。人其实只有一部分理智，同时还有狂热的非理智情感。柏克推论说，现存制度与传统不可能都不好，因为这是数百年来尝试错误后的结果。人民已习惯如此，最好是应加以维护和保留。即使制度与传统不完美，也不必在意，因为事物会自然演进。他也认为，制度与传统当然应该变革，但只能逐渐改变，使人民有适应期。

总之，新保守主义不是反对社会的变革，只是主张在安定中求进步，而非剧烈改变。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提出“温馨的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为号召，不保守的保守主义遂能赢取民心，使得小布什成功入主白宫。

以上述新保守主义检验马华过去的政治路线不也如此？虽然作为一个纯华人政党，但纵观整个国内政局现实和党章第6条款所制定的创党宗旨和目标，很明显的，马华根本没有本钱，更没有必要走极端的种族主义路线。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华裔并非国内的多数族群，而且人口比例也逐年下滑。由于我们已经从过去刚独立时的双族群社会（以巫裔和华裔为主）变质为一个以土著为主的社会，食古不化走纯种族路线肯定没有市场和前途。

更重要的，从该党多年来作为国阵一员的方向和定位，可以清楚预见，马华的目标正如柏克所言，希望通过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步伐打破各族群之间

的藩篱，不分肤色关怀弱势群体，打造一个团结、平等和进步的先进社会。

国阵的中庸协商精神也是一例。经历了上两届大选，在在野党的推波助澜下，许多国民一度对这个中庸执政风格感到嗤之以鼻，认为类似作风过于保守，并坚持在新的网络民主时代凡事应该敢怒敢言，用于表达不满。可是如今随着极端民族主义抬头且濒临失控，许多人开始怀念类似的中庸协商精神并大力相挺，这不正也应证了柏克的新保守主义论述吗？

捍卫国会民主制度， 保障人民基本权益

事实上，倾向于新保守主义并非代表马华放弃民主与自由的追求。反之，根据马华党章，该党非常强调对联邦宪法、民主政府和国会制度的维护。马华像许多民主主义的支持者一样，坚信民主和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而民主代议制则是捍卫这方面基本人权的最有效制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证明，马华对民主精神的贯彻，绝非停留于口号或文宣阶段。例如在过去多届国家大选，即便该党在当中经历了不少的高、低潮，始终尊重选举的结果和人民的选择，不曾通过任何高压手段破坏相关的民主选举制。即便于1969年发生的513暴动，无可否认该党在有关历史的黑暗面经历了其中一个历史性重挫，包括一度不参与内阁，以及往后入阁后

失去了重大的财长和工商部长等要职，但至少没有人会把该不幸事故发生的背后肇因和祸首归咎于马华。

马华对民主精神的坚持，也以身作则贯彻在党内的选举制。很多人或许不察觉，即便贵为马华的创党人和建国元帅，陈祯禄在我国独立后的首次党内选举却也遭遇重挫，于1958年党选被来势汹汹的少壮派领袖林苍佑以89对67票击败，并因此宣布退出政坛。

在黄家定时代，由于意识到绝对的权力会招致绝对的腐败的道理，该党也首开其它国阵成员党先河，通过修改党章限制总会长的任期不超过9年，包括也在中委会议决把相关的任期限制也扩大至部长职、州行政议员职等，藉以在该党打造清明政治风气和健康文化，贯彻儒家思想有异于西方政治学的德政哲学。

无论如何，持平而论，如今从该党多年来所爆发的多次内斗和党争可以发现，该党的中央代表制虽然还是以民主制度出发，但已暴露了不少的弊端和弱点，包括总会长的过大权力、泛滥的幽灵党员、以及金钱政治的盛行等问题。而且，从1980年代的梁陈党争或21世纪的翁蔡党争也清楚显示了该党领导层缺乏民主风度的严重问题，导致党章的民主制多次被曲解和错误诠释，不只对该党的民主选举带来严重破坏，也是该党在民间的形象和声誉一落千丈。

当然，从这个民主角度进一步分析，尤其综合马华建国至今在国阵的态度和表现，也有一些国内外学者把类似

的整体运作形容为协和式民主。协和式民主是政治学者立兹帕特（Lijphart）对于多元分歧社会的精英们，在解决各自所属族群的政治要求时所做安排之描述。他将此模型应用于对比利时、瑞士、黎巴嫩和马来西亚等多族群国家的政治体系分析。虽然他针对协和式运作模式所提出的3大特点，即各族群间的相互否决权、比例代表原则和各族对本身事务运作的高度自主权，似乎与我国的实际族群政治运作有一定落差，但其对这些多元族群政治社会的分析，无疑是具启发与开创性的，且影响了往后许多的相关观察。

该党创党人陈祯禄于1953年召开的《马来亚国民大会》提到，欲使马来亚成为民主的国家，则应该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民掌握政权，以防止政府之专横，使人民参加公共活动和选举，以重民权、以启民智，并使人民不但有遵从法律和缴纳税务的义务，而且对所制定与实施的法律有发言权。

过于注重个人权力斗争， 忽略意识形态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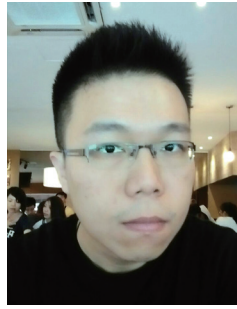
当今马华全体上下面对另一重大危机，则是过于注重个人权力的斗争和追求，缺乏对本身理念和政治意识的认真探索和提升，导致该党逐渐乖离先贤们的创党初衷。即便有不少领袖还是非常认真地作出贡献和付出，但只关注一些

小修小补的民生服务和作秀政治，缺乏作为政治组织所应该持有的宏观问政格局，把焦点放在真正影响全民的政策问题。

甫经历308政治大海啸时，我曾经强调，一个政党可以失去政权，但不可失去理念。而这种对于理念、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的追求，其实并非纸上谈兵的学术性探讨而已。马克思甚至表明：哲学的任务不是在了解世界，而是改变世界，以产生一个与以前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事实上，自古至今环顾国内外，意识形态作为政治中的信仰、行动与推动力，一直在影响着政治的持续与变迁。

所以，一个政党缺乏政治理念，就像一个人失去梦想一样，会感到漫无目的、若有所失，乃至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左派也好，右倾也罢，至少各方的支持者曾经为人民提出一个明确方向，并根据有关基础阐述更细节性的政纲，有关政经文教各领域的主张，以及针对各项议题的回应方式。这篇拙文只是我针对马华创党和执政多年所累积的经验 and 实践，所梳理和整理出的部分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等个人见解，希望可以在党内引起更多的探讨和探索，甚至获得当代领导层的关注，为该党提出一套更详尽和具代表性的相关政治主张和方向，丰富该党的政治内涵。

立新



陈祯禄政治理念的形成与论述

甘德政，复旦大学博士。时事评论人、报章专栏作者及马华公会中央党校讲师。曾任马华中央党部新闻执行秘书，担任《马华快讯》、《蓝天》及《蓝天快报》的执行编辑和主笔。

陈祯禄在1926年已经呼吁建立统一自治的马来亚，强调“我们应在人民中间，培养与创设纯粹的马来亚精神和意识，并逐渐把种族性观念完全消除”。其实，他在担任海峡殖民地的立法会议员时，已经对殖民政府的“亲马来政策”提出严正的抗议。他指责这项“亲马来政策”的证据，可从英殖民政府在土地、教育和移民政策中推断出来。

陈祯禄更在1932年明确提出“政府之政策应该是‘马来亚人之马来亚’（Malaya of Malayan），而不是其中一部分人专有”的论述，可谓马来亚的土生华人当中提出“独立建国”论述的先驱者。陈祯禄为了表示他对马来亚的忠诚，他公开宣布支持1932年政府对中国的国民党的取缔。然而，在当时英殖民政府的威权压制之下，陈祯禄的理想一直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1949年中共建国，冷战格局正式形成，虽提升马共士气，但也加深马来人怀疑华人的效忠问题。这时，马来亚华人的处境已到了最危险的地步，陈祯禄等人及时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代表华人与英殖民当局合作，阻止华人被遣送回中国，并协助60万在新村的华人安家，华人的情况才稍微好转。之后，在英国人的主导下，1951年，代表马来人的巫统和代表华人的马华正式结盟，奠定日后的族群政党合作模式。1955年组成“巫华印联盟”（Alliance），代表三大族群的政治力量，赢得马来亚的第一次立法议会选举。联盟挟着强大的民意基础，和大势已去的马共展开和谈，并开始制宪过程和派代表前往伦敦展开独立谈判。

在马来亚迈向独立的过程中，华人的效忠问题始终是各方所关注的议题。当时绝大部分的马来亚华人仍保持中国国籍，只有少部分的海峡华人进了英国籍，这个时候，初掌政权的北京当局的态度是影响马来亚华人的关键所在。在中共建国之初，由于国力所限，只好改变以往国民政府的做法，不再视保护海外华侨为一种权利和义务，反而自视为国际共产的重要一员，对外一面倒向苏联，参加韩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加紧在全球各地展开反共活动，尤其在华侨众多的东南亚，更是把20年代以来就有的“排华”论调和当时最流行的“反共”论调挂钩。

一直到了1955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后对东南亚华侨申明中国政

府的立场：（1）取消华侨华人的双重国籍；（2）坚持中国国籍的华侨，不应参与或干涉当地国的政治。此时大局已定，处在这种环境下的马来亚华人其实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当时很多华人都是含着泪放弃中国国籍去“入番”。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宣布独立，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在马华公会的努力之下，超过100万的华人获得了公民权。与印尼华人相比，马来亚华人的集体命运相对而言算是较为幸运。无论如何，在冷战时期的东南亚各国是欧美势力围堵中国的前线，中共的“革命输出”也造成东南亚各国更加排斥北京当局。南洋华人对于这种身不由己的命运摆布更必须显得小心翼翼。

事实上，在“反华”与“反共”两股意识汇流的年代，为了将南洋华人与中国的文化历史联系拦腰切断，从学术上建构一个新的族群，或者制造一个“华人可被同化”的神话，在当时是属于“政治正确”之举。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出自这个特殊群体“峇峇与娘惹”的名人，包括来自檳城的辜鸿铭（曾任北大教授）、来自新加坡的林文庆（曾任厦门大学校长）、来自马六甲的陈祯禄（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的创办人）、来自雅加达的李登辉（曾任复旦大学校长），仅因为他们身上或多或少流着“非我族类”的血液，加上他们多数受西方教育的背景，就从猎奇的视角把他们归类为另一个“虚构的种族”，而根本忽略了他们的家族在日常生活或婚葬习俗当中，所保存的中华文化元素之

多，甚至比许多华人还要像华人。

但是，主观的认同无法改变客观上的残酷现实，话语权始终不在华人手中。也许，英殖民政府官员布列兹的这番话很清楚地表达了当权者的立场：

“一个基本的文化改变，在未来通过一个不太西化但马来亚化的方式，以提供在地的符号，使到那些被慷慨资助的学生们，其维持利益、热情和忠诚的华人传统能够被取代。毫无疑问，这些改变将会遭到“向中看”

（China-looking）团体的强力抵制，就像之前那些要在他们的学校里消除中国政治影响的措施一样，但是，如果要使一个庞大的华人社会能够被同化（assimilated）并成为独立国家的公民，这些文化调整必须很快地落实。

简言之，马来亚华人的身份认同（或者可以说是认同上的“撕裂”）是西方殖民者的政策、中国大陆的政治变化、各族群之间互动等多方面博弈所产生出来的结果。这种情况，有如温特所说“身份有一种主体间或体系特征。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建构而成的”。所以，对于身份认同这样具有复杂心理过程问题的考察，就必须分析影响它的诸多因素，如认同的动机、认同对象的作为、认同者自身的经历和认同的环境等。只有加强对身份认同复杂性的认识，才能更理解马来西亚华人政治认同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何作为主导族群的马来人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下产生不一样的认同。

由于冷战时代的高压政治和白色恐

怖阴影使然，在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华人问题”长期以来都是极为棘手和敏感的政治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文化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当地民族主义掌权者出于现实的政治利益考量，在教育和文化政策上都不会对刻板印象中掌握经济大权的华人“客气”，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的“熔炉论”来高举同化政策，将根深蒂固的“反华”恐惧和新起的“反共”潮流汇合（颇类似希特勒将东欧的“反犹”和“反布尔什维克”合流的例子），形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当地土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堡垒。

在那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人几乎都会出于“求生本能”，在进行表态时用强烈的措辞来和“政治中国”切割，并在传统习俗上更坚持“中华文化”来和某种程度上被西方媒体污名化的“共产主义无神论”切割，借以降低当地民族主义的敌视情绪。这种多少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的“政治表态”，几乎贯穿了整个冷战时期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舞台，即使在华人占相对多数的新加坡也不例外。当地的领导人长期抱着“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小红点”的强烈危机感来战战兢兢发展这个城市国家，在教育和文化政策方面更倾向“西化”（或可称为资本主义的“异化”），致使一两代后的新加坡华人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主体性”；反观分家后沦为相对少数的马来西亚华人，却在长期的马来民族主义和马哈迪式的“文化霸权”

（葛兰西语）压制之下，却发展出异常“坚韧”的“文化主体性”，这不啻为一种极为吊诡的“文化现象”。

这种强调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加以切割的论述，早在1950年代时，马来亚华人公会创党人陈祯禄就如斯说：

“我们仍然可以保存自己的文化，依然是华人，只是政治上已成为当地公民，愿效忠本邦，以本邦为永久家乡。”

在维护本身的文化传统方面，这位受英文教育的英籍土生华人比许多华人还更加执着：

“每个华人都应该熟读《四书》《五经》这些古训，因为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道德、社会及生活的基础。我们还要明白中庸学说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德的道理。”

“华人若不爱护华人的文化，英国人不会承认他是英国人，马来人也不会承认他是马来人，结果，他将成为无祖籍的人。世界上只有猪牛鸡鸭这些畜牲是无所谓祖籍的，所以，华人不爱护华人的文化，就是畜牲禽兽。”

“根据教育专家的结论，马来亚的华人，尤其是在家庭里说中国话的华人必须接受母语教育，因为这样才能使他们依照他们的文化和传统充分地发展及树立根基。失掉了自己文化熏陶的人们，绝对不会变成更文明的。一个人的方言正像一个人的影子，不能够和她本身分离的。”

“我们马来亚华人，一定要保持我们的母语，更绝不应忽视能使我们成为善良人民的我们民族最高尚的道德

理想，这个原则鄙人认为是绝对正确的。”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念兹在兹要用“民族主义”把“一盘散沙”的华人凝聚成一个“坚固的混凝土”。但这种“混凝土”最终是要海外华人为遥远的“祖国”的利益而服务。陈祯禄意识到这种思想对马来亚华人在政治上的危险性，因为这很容易就被殖民地当局扭曲成“不效忠当地”，并成为当地土著的“排华”思想源头。

陈祯禄虽然也在其论述中不断引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混凝土”观点，来倡导马来亚华人的民族主义，但他的最终政治目的和孙中山是有根本的分歧，那就是要把当地华人的认同从“落叶归根”转向“落地生根”（王赓武语）。若要三言两语来概括陈祯禄反驳来势汹汹的“同化论”，其逻辑可表述为：“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华人，就必须学习和认同中华文化；只有成为一个更好的华人，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马来亚公民。”

事实上，陈祯禄一直以来不断地在思考华人的“定位”问题，他从一开始就把本身的族群称为“马来亚华人”

（Malayan Chinese）以及后来的“马来西亚华人”（Malaysian Chinese），甚至在成立政党时也用这个称号，这些决定就揭示了“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之间，何者为纲，何者为常，当时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场。作为“主体性”的最重要来源，“文化身份”绝对要比“政治身份”来得重要。反观不管是

“马来亚人”（Malayan）还是“马来西亚人”（Malaysian）的“主体性”内涵，在一个新独立的国度中都非常欠缺，这也就是为何叫“马来西亚华人”而不叫“华裔马来西亚人”的重要原因。

在1950年代的“大江大海”（龙应台语）时期，东亚冷战格局的形成对仍然身为“华侨”身份的马来亚华人极为不利（有关华人是“第五纵队”之说时有所闻），面对着可能遭到集体驱逐出境或赶下南中国海的厄运，马华公会创始人陈祯禄审势度势地拍出洛克、伯克、阿克顿爵士等的英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英殖民当局据理力争，并权通达便地利用洋人法律中强调的“公民”

（Citizen）概念来取代以前的大英帝国臣民概念（British Subject），以配合洋人的国际“游戏规则”来争取“独立建国”。这段历史促成了史无前例的海外华人集体放弃“华侨”身份并转化为新生国家的“公民”的浩浩荡荡“社会运动”。

虽然如此，陈祯禄本人却非常担心马来亚华人可能面对着文化上“失根”的问题，所以他一手拿英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来应付英国人，另一手却在马华公会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上搬出“四书五经”，想尽办法在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中的他者“文化霸权”压力之下强调本身族群的“文化主体性”。当然，陈祯禄对于中华典籍中的“霸道”思想还是有所警惕，他与《中华民国宪法》起草人张君勱的交往书信

中，在他充满理想主义思想的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想以英美自由主义学说补充儒家学说（尤其是王道思想）的不足之处。对他而言，自由主义才是新“道统”，中西方学说互补互惠可以促成“世界大同”。这种思想，与张君勱

主张的“自由民族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立新

“意识形态”（Ideology）在政治学里面，不同语境中衍生不同的意义，造成理解上的混淆而产生争议，因此在讨论“意识形态”之前，概念需要先作厘清。

政治学者Martin Seliger认为意识形态意指：“(i)提供对既有秩序的一种解释，通常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ii)提供一种追求未来的模式，且对理想的社会提出它的看法；(iii)阐述政治变迁可能或应该如何发生。……意识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而是由一组不固定的观念所组成，这些观念在某些面向具有相互重叠的见解……”

（Heywood, 2007）。

耶鲁大学学者Frederick Watkins认为“意识形态”的讨论始于Adam Smith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也就是1776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哈佛大学学者Daniel Bell教授在他的著作《*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1950s*》

（1960）中首先提出意识形态终结的论点，他认为独裁共产主义注定失败，由于福利国家的概念同样受到左右派的认同，意识形态辩论已经结束。

在冷战结束后，Francis Fukuyama断言自由主义式民主已经获得最后胜利。Anthony Giddens则认为基于时代的变迁，左和右的说法已经失去其现代性意义。Samuel Huntington则不以为然，他在他的《*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6）对意识形态终结结论进行了反



政治意识形态的简介与讨论

李荣健，马来西亚多媒体大学管理系学士。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雪州马青策略局副局长。曾任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长特别事务官、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机要秘书。

驳，他认为身处不同文明的人会因为价值信仰的差异继续产生冲突。

无论如何，从18世纪末一直到今天的意识形态辩论和发展，书写着人类这两百年来精彩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史。接下来我们浅谈其中一部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重大影响意识形态理论、以及世界各地以意识形态或政治路线区分的国际政党联盟。

左派与右派

当我们谈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时候，一般上就以一个由左到右的“意识形态光谱”（Ideology Spectrum）来为各种意识形态做出简单的分类。这种分类可能不够严谨，但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参考。

左派右派之说源自于1789年法国大

革命时期的法国国民议会，当时坐在议会左侧的是主张革命，推翻阶级的激进派；而坐在议会右侧的则是拥护君主制度与贵族的保守派。

而时至今日，西方政治左或右的分野讨论，则大部分都集中在政府在经济事务上的干预程度，主张政府在经济上大量干预市场的被称为左派，推崇市场经济的为右派。

在非经济事务上，普遍上的说法是右派比较倾向维护传统价值，强调爱国主义；左派则比较提倡平等平权，自由价值等等。除了以上这些简单的区分，当代政治的左右之分还是相当复杂的，它无法简单地以一刀切的方式作出区分。

自由主义 Liberalism

政治意识形态的讨论通常都是从自由主义开始说起的，因为早期的自由主义形态批判专制与封建，封建社会的瓦解后，随后开展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辩论才能随之展开。

自由主义在19世纪初才发展一套成熟的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要素包括：

- (1)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为最大原则，个体比社会团体重要；
- (2) 自由（Liberty）价值高于平等、正义或权威；
- (3) 相信社会和个人是理性的；
- (4) 平等，强调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

等；

- (5) 宽容，相信多元主义，容许道德文化差异；
- (6) 权威的正当性以被管理者的同意或意愿为基础；
- (7) 宪政主义，相信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概念。

古典自由主义

Classic Liberalism

古典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John Locke（1632-1704）和Adam Smith（1723-1790）。John Locke是英国的哲学家，他强调生命、自由与财产的权利，他坚信个人自由是重要的权利，并对人类本质持乐观的看法，认为政府对人民的限制是不必要的。Locke为自由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关键的基础。Locke重要的著作包括《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1689）与《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1690）等等。

Adam Smith是苏格兰的哲学家与经济学家，他提倡市场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认为政府干预市场会阻碍经济发展，相信市场会自我调适，透过“看不见的手”（the invisible hand）达致均衡。他所提出的自由贸易理论为世界经济与贸易带来了长远而重大的影响。Adam Smith最重要的著作包括《The Wealth of Nations》等等。

其他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还包括起草美国独立宣言的Thomas Jefferson和美国宪法之父James Madison。

在19世纪末，自由主义发展出另一

个新的流派：现代自由主义（Modern Liberalism），而古典自由主义被共和党 and 保守派所继承，所以现在在美国政治里面，古典自由主义是美国的保守主义。

现代自由主义

Modern Liberalism

19世纪末，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市场经济扩大了贫富悬殊的问题，Adam Smith的市场自我调适理论受到了质疑。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Thomas Hill Green（1836-1882）认为当市场经济为人民带来了祸害（贫穷问题）的时候，国家有必要干预经济事务，才能塑造一个自由的社会，保障个人自由。Green认为古典自由主义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而现代自由主义抱持的是属于更积极主动的态度，不是说自由市场就什么都不管，而是积极出手保障人民有适当生活水平的自由。也因为这个观点，现代自由主义也被称为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

Thomas Hill Green其中一部著名的著作是《*Prolegomena to Ethics*》（1883）。

在非经济事务上，现代自由主义就依然秉持著古典自由主义的观念，政府应尽量少去干预。美国的民主党就承袭了现代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第32任美国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也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推行的“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应付当时的经济大萧条，也属于现代自由

主义的实践。

保守主义 Conservatism

18世纪末19世纪初，面对着法国大革命给当时的社会政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开始建立，保守主义者捍卫传统的社会秩序，维护旧体制，他们认为传统的价值不应该轻易被抹杀。但以其说保守主义排斥革命，不如说他们认为革命带来的变化不会比保存现状来得好。

保守主义的要素包括：

- (1) 肯定和尊重传统；
- (2) 实用主义，认为抽象的理论不实际，经验更值得信赖；
- (3) 认清人的不完美性，对人的本质持比较悲观的态度；
- (4) 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不只是不同个体的结合，也涵盖价值和文化；
- (5) 社会的层级体系是无法避免的；
- (6) 认同由上而下的权威领导；
- (7) 重视财产拥有权。

古典保守主义

Classic Conservatism

古典保守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是Edmund Burke（1729-1797）。Edmund Burke是英国的政治理论家，也被称为西方的保守主义之父。Burke和Adam Smith是生长同一个时代的人物，在他的理论里面比较缺乏经济方面的讨论，

但在政治上，他认为历史、经验和传统里面有其值得保存的价值，但又不全然是一成不变，因为Burke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变革是为了保存”

（Change in order to conserve），强调循序渐进地改革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

Burke也批评自由主义对人性过于乐观，忽略了人的非理性部分，也因为这样法国大革命演变成激进主义，付出了太高的社会成本。Burke最著名的著作是《*Reflections of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

古典保守主义另一个有趣的理论是“平等”是不存在的，如果人刻意要追求平等，就会侵害到“自由”，而古典保守主义者认为自由比平等更可贵。

现代保守主义 / 新自由主义 **Modern Conservatism / Neo-liberalism**

根据国立台湾大学王业立教授的看法，现代保守主义是美国学术界的主流说法，它在欧洲却被称为“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就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一代宗师Milton Friedman（1912-2006）。新自由主义支持古典自由主义里最小化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坚信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效率，主张市场个人主义。Milton Friedman的重要著作包括《*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Free to Choose*》（1980）等等。

在经济面向继承一定程度的古典自

由主义特色的现代保守主义，在非经济事务上则是承袭了古典保守主义的理念。现代保守主义普遍上被认为是美国共和党所抱持的意识形态。Milton Friedman就曾经担任共和党总统Ronald Reagan的经济顾问。

新保守主义 **Neo-conservatism**

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源自于政治哲学家Leo Strauss（1899-1973）的思想学说。新保守主义提倡国家政府重新树立权威、回归传统价值，重视家庭、宗教和国家的观念，建立应有的秩序。他们也认为这种价值秩序的整顿有利于社会团结。

新保守主义质疑多元文化主义，因为他们认为这将会是冲突的导火线，所以新保守主义者对超国家组织如联合国和欧盟也是保持着质疑的态度。

新右派 **The New Right**

新右派属于保守主义旗帜下的一个重要流派，并曾经在美国和英国都有过巨大的影响力，最为人知的体现就是1980年代的柴切尔主义（Thatcherism）和雷根主义（Reaganism）。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与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这两种特定传统连接起来时，新右派才构成一致且有系统的哲学，虽然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存有紧张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目标同样都是在支持强盛但干预程

度低的国家。”（Andrew Heywood, 2007）。这也解释了为什么Thatcher和Reagan常常被同时归纳为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拥护者。

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著有《*The road to Serfdom*》（1948）、《*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和《*Law, Legislative and Liberty*》（1979）等作品，他的著作对新右派的政治哲学发展影响深远。Hayek信仰个人主义和市场秩序，批判社会主义，反对经济干预。

社会主义 Socialism

社会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由Thomas More（1478-1535）所著的《*Utopia*》（1516），但社会主义是在19世纪初才开始真正地形成一套政治哲学。相对于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涵盖面更广的意识形态，概括了经济、政治、社会和道德的哲学。社会主义最早期就有着革命的特质，目标就是要根本性推翻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Karl Marx（1818-1883）是社会主义阵营里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思想成为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他也成立了国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IWA），也就是“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推动无产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接下来在20世纪的发展，主要分为两大阵营：其一是由奉Vladimir Lenin（1870-1924）为导师的共产主义（Communism），其二则是由Edward Bernstein（1850-1932）所发展出来的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

社会主义的要素包括：

- (1) 强调社群的重要性，每一个人都只是社群的组成部分；
- (2) 博爱；
- (3) 社会平等，特别强调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机会的平等；
- (4) 相信物质利益根据需求来分配，而不是以工作或能力为基础；
- (5) 视社会阶级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
- (6) 提倡共同所有权（Common Ownership），而非私人财产。（现代社会主义已经放弃这个观念）

马克思主义

Marxist Socialism

Karl Marx是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也被视为共产主义之父。Marx和他的挚友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一起写了“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号召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Marx的思想学说在他逝世后才开始广为流传，Friedrich Engels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位创始人，他是Marx最忠诚的战友，也是负责完成《*Capital*》的哲学

家。

马克思主义聚焦讨论资本主义的弊端，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阶级矛盾，雇主和工人之间存在的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终将带来冲突。马克思也相信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并由社会主义取而代之。

20世纪的共产主义现象与运作其实大部分都有别于古典马克思主义，后来的列宁主义（Leninism）和史达林主义（Stalinism）已经不能和马克思主义一概而论了。

共产主义

Communism

共产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为Vladimir Lenin，是一位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Lenin认为自己承继的是正统马克思主义（Orthodox Marxism），延续的是革命式的马克思主义。Lenin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掠夺，建立殖民地，发展成帝国主义，使到资本主义没有走向自我毁灭，这论点回应了马克思理论里所提到资本主义自己走向灭亡的预言并没有发生的现象。

Lenin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在于他重视政党组织，他认为革命政党应该由忠贞的革命分子组成，并不是走群众型政党路线，它必须是一个组织阶层严谨，严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党领政的政党（也称为列宁式政党）。

Lenin去世之后，Stalin除了将苏联变成一个极权独裁统治的国家，也建立了一个国家集体化与中央计划性经济的

模式。直到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之后，欧洲的共产主义也走入了历史。

社会民主主义

Social Democracy

社会民主主义被视为是修正主义式（Revisionist）的马克思主义，Edward Bernstein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的《Evolutionary Socialism》（1901）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读物。Bernstein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主张，采取通过工会和政党进行体制内改革的方法，为无产阶级争取最大利益，而不再以革命路线作为达致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

当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非常注重福利政策，同时认为政府不应该介入经济活动，所以有学者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的内涵相当接近。

第三条路

Third Way

第三条路提供了传统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外的另一条出路，它结合了多种意识形态，包括现代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Heywood, 2007）。“第三条路”承认了市场经济是难以取代的经济模式，同时认为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提倡道德责任与社会安全，抗衡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压力。第三条路也支持机会平等与绩效，同时主张一个不会让人过度依赖的福利制度。

第三条路其中一位主要的倡导者是社会学家Anthony Giddens，他被誉

为英国前首相Tony Blair的精神导师，Giddens对英国工党（Labour Party）的发展也影响很大。

民族主义 / 国族主义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强调（也可能夸大）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优越性，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时期，当时的欧洲正努力摆脱封建的宗教束缚，摆脱贵族统治，很多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从此诞生。而更接近当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则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开始蓬勃发展，从欧洲扩展到全世界。

当民族国家受到侵占或压迫时，民族主义就是一个重要的号召，历史上很多统一国家和反殖民的独立运动都以民族主义作为感召。同时，民族主义也是很多政府用来巩固人民对政府的效忠的手段。

到了21世纪的今天，种族并不见得是民族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著名学者Benedict Anderson在他的《Imagined Communities》一书里就提到说，民族国家是一个想像共同体，透过共同的意识形态、情感、历史记忆和教育来塑造。“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就是一例。

环境主义 Environmentalism

环境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是英国科学

家James Lovelock的Gaia Hypothesis，假定地球是一个“有机体”，人类和大自然之间是一个相互调节的体系。

环境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因为工业化快速发展，对环境带来了破坏，人类开始反思本身与大自然生态的问题。环境主义者希望通过政治管道，建立制度，采取更环保的政策来保护环境。1970年代之后，绿党（Green Party）开始在欧洲兴起，德国绿党更在1998-2002年之间入阁执政。

国际政党组织 Political Internationals

国际政党组织是跨国的政党联盟，意识形态相近的政党组成国际连线，创造了一个互动平台，互相支援、联系。目前国际间主流的国际政党组织包括中间偏右的“国际民主联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推崇自由主义的“国际自由联盟”（Liberal International）、偏左的“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还有历史较短，主张环境主义的“全球绿党”（Global Greens）。

虽然说世界各地依然有许多的政党没有加入这一类的国际政党组织，但国际政党组织的出现替很多的政党作出了意识形态上基本的归类。

国际民主联盟

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 IDU

国际民主联盟是一个拥有全世界超

过80个保守党，基督教民主党和任何理念相近的中间、中间偏右政党的政治联盟。国际民主联盟成立於1983年，提供了一个平台给这些拥有相同理念的政党建立互动联系，推动世界各地的民主，推广中间偏右的政策。

国际民主联盟的创始人包括当时的英国首相Margaret Thatcher、美国副总统George Bush Sr.、法国总统Jacques Chirac、德国总理Helmut Kohl等其他政党领袖。

国际民主联盟的成员包括美国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英国保守党（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Party）、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CDU）、法国人民运动联盟（Union for a Popular Movement, UMP）、澳洲自由党（The Liberal Party of Australia）、台湾国民党（Kuomintang, KMT）、韩国新世界党（Saenuri Party）等等。

国际自由联盟

Liberal International, LI

国际自由联盟是属于自由主义政党的国际联盟。该组织成立于1947年，目标是凝聚世界各地自由主义政党，推广自由主义。他们保持的共同原则包括：尊重人权、自由公平选举、多党制民主、社会正义、宽容、社会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环境永续性和高度的国际间团结意识。

国际自由联盟拥有超过60个正式成员，当中包括德国自由民主党（Free

Democratic Party）、英国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s）、菲律宾自由党（Liberal Party）、台湾民主进步党（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泰国民主党（Democrat Party）、柬埔寨救国党（Cambodia National Rescue Party）等等。

新加坡民主党（Singapore Democratic Party）、印尼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我国的人民公正党（PKR）和民政党（GERAKAN）则都是国际自由联盟的观察成员。

社会党国际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SI

社会党国际是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社会主义政党和工党组成的全球性组织。目前，它汇集了来自各大洲的168个政党和政治组织。

社会党国际，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889-1916的国际性工人运动 – “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国际），社会党国际目前的形式是在1951年法兰克福会议（Frankfurt Congress）後重新建立的。目前社会党国际里的其中58个成员政党在不同国家执政。

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包括英国工党（The Labour Party）、德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SPD）、法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澳洲工党（Australian Labor Party, ALP）、日本社民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和我国的民主行动

党（DAP）等等。

结语

马来西亚在二战后民族主义的兴起让我们摆脱了殖民主义，走向了独立建国。我们复制了英国的西敏寺制度，摸索出一条属于马来西亚的政治道路，五十多年下来，马来西亚政党的斗争极少有意识形态的论争，政党之间的政策比较也不常见，因为我们一直身陷种族偏见和宗教化的泥沼中，而无法自拔。

虽然说国家的政治发展未必需要沿着西方政治的路子走，但毕竟意识形态辩论经历过百年的实践与辩论，它肯定能提供更辽阔的面向与视野让后人参考。我们可以做的，是取其精华与去其糟粕，提升从政者的政治素养，提出有足够理论基础的政见，远离民粹，让朝野政党之间的较量能够在更大的格局上一较高下，这才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

立新



马华的基本路线

广招党员运动委员会编：《入党辅导班课程》，
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公会，1983年，164-170页。

路线和策略的分别

每一个政党都有它的斗争目标，为了达致这个目标，它必须遵循一定的斗争路线。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固定的斗争路线，就会像一艘既没有指南针，又不遵守固定航线的船那样随波逐流，随时都有触礁沉没的危险。

马华公会在漫长的三十一年斗争过程中，没有在波涛汹涌的政海中消失，正因为它有固定的斗争路线和方向。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所谓固定的路线，并不是说一个党的路线一经决定下来，就一成不变，永远不能更改。而是说，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路线不能随意改变，斗争路线和斗争策略是有分别的，斗争路线不能朝秦暮楚，反反复复，但斗争策略则可以随机应变，灵活应用，以适应环境的需求。

马华的斗争总目标

要了解党的斗争路线，首先必须了解党的斗争目标和宗旨。马华公会的斗争目标或宗旨，可以从马华公会章程的第二章“宗旨及目标”里找到，这一章的内容共有十六条纲领：

- (1) 确保和防卫马来西亚之独立及主权。
- (2) 确保和维护马来西亚宪法。
- (3) 确保和维护一个以多元种族为基础的议会民主政体原则。
- (4) 争取及维持人权之行使，纠正不公平之现象，并扶助贫乏之人士。
- (5) 确保马来西亚宪法内全体民族之合法权利及利益获得承认和保护。
- (6) 维持、培养和促进马来西亚各种族间之亲善与和谐，以确保一个强大及团结的国家在和平中进步与成长。
- (7) 以合法及符合宪法之方法，促进、维护，并推进本会会员在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经济与其他方面之利益。
- (8) 考虑援助并处理有关全体会员之各项事宜，并为彼等之福利和进展得采取被认为需要之步骤。
- (9) 促进本国经济资源之充份发展利用，以利本邦全体公民之利益。
- (10) 促使本邦全体公民获得充份与平等之就业机会。
- (11) 增加与改良本邦产品，以促进高度之生活水准。
- (12) 为本邦每一公民争取并维持社会正

义、经济安全及平等机会。

- (13) 鼓励、建立，并发展合作社运动。
- (14) 与在马来西亚境内注册且具有本党相同宗旨与目标之其他政治团体共同工作，以促进政党与政党之健全发展。
- (15) 保存与维护华语华文之应用与学习并且确保其在马来西亚宪法第一五二条明文规定下应用教授与学习不得被禁止和阻挠。
- (16) 进行以上各条以外之事宜，以谋求本党之一般利益。

从上面十六项纲领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五项党的斗争总目标：-

- (1) 服膺于民主自由理想，捍卫宪法，维持法治精神。
- (2) 争取各族人民之平等权利。
- (3) 伸张社会正义，保障人权。
- (4) 促进国家繁荣和成长。
- (5) 促进种族和谐、团结与合作，主张种族融合，反对种族同化政策。

要了解我们党的斗争路线，除了须了解其斗争目标之外，也必须充份了解过去三十多年来国内政局的演变，以及当前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现实。因为斗争路线是根据国家人民的愿望，而且考虑了特定期间的客观环境与条件之后而制定的。

我们必须承认，华族在本邦是属第二大种族，无论是在人口或选民数目上，都落在巫族之后，正因如此，在政治权力分配中，我们也居于被支配

(Subordinate) 的地位。但是同样必须认清的是，华族这一个“少数集团”

(Minority Group) 是一个庞大的少数集团（在人口方面，华族占35%。）

因此，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操纵、处置或轻侮的少数集团。如果华族同胞能团结一起，把政治力量高度集中起来，那么这一股力量是足以左右国家决策的制定的。

马华的斗争路线

明白了党的斗争总目标以及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现实之后，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路线就显而易见了。

首先，因为我们服膺于民主自由理想，我们无可选择地必须采取和平、中庸的宪制斗争的路线，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形式和性质的极端主义、偏激思想，以及暴烈的斗争手段。在争取民族的合法权益方面，我们主张采取互相谅解及和平协商的手段。马华在五一三事件暴发时的虽短暂退出内阁，但终于决定留在联盟政府内，而当联盟政府被扩大为国民阵线时，也继续扮演国阵伙伴之角色，正是基于上述的和平、中庸的政治路线。

我们认为，在马来西亚这个种族多元化，宗教多元化，及文化多元化的国家里，唯有把“中庸之道”作为治国的基本方针，而且在思想及行动上“中庸”的路线，才能够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和平、安定、进步及繁荣。

我们也觉得，唯有实践“求同存

异”的原则，只有切实地采取容忍的态度，才能够顺利地渡过一个无可避免的过渡阶段，把我们这个社会带进一个打破了种族藩篱的阶段，这么一来，才能够实现了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崇高目标。

因此，党的政治路线，是中庸的斗争路线，我们要捍卫真理与正义。我们反对不公平与不合理的一切措施，但是，我们也不主张采取过激的斗争方式。我们不要冒险主义。

我们不但自己要走中庸的路线，同时也要协助与支持友党走中庸的路线。我们要跟友党及其他走中庸路线的开明人士密切合作，为国家的和平与幸福共同努力，因为走中庸路线如果只是“单程交通”或者只是一厢情愿，那是不会有什么作用的。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认为，华族的政治力量必须大大地加强之，我党的组织也必须扩大，这么一来，才能够有效地跟友党及其他走中庸路线的人士合作。反之，如果我们本身不争气，在政治上软弱无能，就没有条件跟他们有效地合作了。

不过，必须指出，走中庸路线绝对不是意味着我们准备牺牲华族的基本权益，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低声下气地去接受不公平与不合理的对待。

和平、中庸并不等于无条件的投降，在三大民族的权益分配中，由于我们的讨价还价力量的薄弱，我们深切知道，许多合法合理的民族权益一时无可能完全实现，但是我们绝不因此而放弃

和平、中庸现实的斗争路线，我们也不像反对党那样一味盲目进行无谓的消极反对（Negative Opposition）。我们认识到，无论是争取民族平等权利，还是伸张社会正义的事业，都是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必须标本兼治长期奋斗才能成功。因此面对在种族极端主义的压力下所引起的种种偏差现象时，我们选择了积极的反应方式（Positive Reaction），应用创造性思想，充份发挥自力更生的精神，制定了种种对策，而且技巧地及运用我们的斗争策略，使它得以发挥高度的效果。

我们一方面唤起华裔同胞对于他们的真实处境的觉悟，号召华人大团结，通过大团结，统一整体目标，集中政治力量，以便发挥更大的效能，一方面遏阻种族极端主义势力抬头，另一方面，增强我们在各族合法权益分配中的讨价还价力量，以及有效的监督政策的施行，以免发生更多偏差。

另一方面，我们拟定和推行了政治、经济和文教等等的自强自救计划，以带动华裔社会，摆脱情绪的干扰，发挥自动自发，庄敬自强的精神，以确保更加美好的前途。

我党的国民团结路线

上面已说过，我党主张种族和谐、团结与合作，主张种族融合，而不是种族同化。因此，我们全力支持缔造国民团结的一切努力。我们深知全民大团结或一个融合无间的大马社会（Fully

Integrated Malaysia Society) 的理想，并不是一蹴即成。由于考虑到大马社会的特殊结构以及自独立到现在的政治现实，我们认为所谓没有种族界限的“大马人的大马”，或者所谓“多元种族政治”在马来西亚历史发展的现阶段都是空中楼阁，与社会政治现实不符。

在现阶段，各族本身的团结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只要巫统一天不放弃代表巫族争取权益，那么，华人政党代表华族权益也就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盲目地主张不谈本族团结，高唱“大马人的大马”调子，只能使我们华人社会更加分裂，永远寻不到凝聚的基础，无从自我肯定（Self Assertion），更加无法发挥集中的政治力量，结果是在合理的权益分配中，丧失应有的讨价还价地位，造成更加严重的种族权益分配不平衡现象。

因此，马华的一贯主张是：在原有的多元种族社会及政治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国民团结必须通过种族团结去实现。各种族的团结跟全民的团结并不互相矛盾，相反的，是相辅相成，因为种族团结的目的不在对抗和恶性的竞争，而在于亲善合作。个别种族的团结最终目标就是国民团结。个别种族的政治力量太过分散和缺乏代表性，不但对于有关的种族团结不利，而且也对于全民的团结不利。

通过个别种族的团结来维持各族之间的政治力量的均衡，是现阶段我国政治稳定的必要步骤。因为在一个种族团结一致，政治力量高度集中，而另一个

种族则四分五裂，政治力量高度分散的情况下，极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就很容易抬头，其结果就是种族情绪高涨，国家政治稳定受到威胁，真正的国民团结根本就无法实现。

群众路线

作为一个以华人群众为基础，而且矢言维护与促进华族的权益的政党，作为国阵里头代表华人利益的一个成员，马华显然必须教育及领导各阶层华人群众，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股有目标，有纪律的政治力量，这么一来，才能够实现党的斗争目标，尤其是当我们这个民族所背负的历史包袱造成了在宪法的安排下以及在选区的划分办法下，党的讨价还价力量被大大削弱之时，党面对的组织工作就更加重大了，也正因为此故，走群众路线是有迫切需要的。

我们必须在群众路线下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可以组织的一切力量组织起来，不分阶级，不分性别或宗教信仰，这么一来，才能够增加党在政治上讨价还价的力量，才能够使党更有效及更灵活地去运用它的斗争策略，从而达致党的斗争目标。

“群众路线”是拿督斯里李三春同志在一九七四年间接任党署理总会长之时首次提出来的，它并不单纯是一个政治口号，而是党斗争的总路线的一部份。所谓“群众路线”就是说，党的斗争目的完全是以群众或整体的利益为依归，而不只是为了某一个阶级或某一个

集团的利益着想；党是为群众或整体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或某一个集体的利益服务。换句话说，“群众路线”是党的斗争的基本路线，它必须在党的斗争总策略中反映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许多年来，党在各领域里采取的重要措施及政策，都是以“群众路线”的基本原则为依归的。

(1) 在政治上走群众路线——我们马来西亚是一个实行国会民主制度的国家，在民主的国家里，一个政党跟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好像鱼跟水一样，鱼离开了水，就无法生存。同样的，一个民主政党如果跟人民群众脱了节，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就不能生存下去，就算能够勉强存在，也是处于半生不死的状态，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马华是一个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我们矢言要维护及促进华人群众应有的权益。我们要代表华裔社会反映及表达他们的心声，所以，党必须时时刻刻跟华裔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

就好像华族的命运跟马来西亚的命运分不开一样，党的前途跟华人群众的前途也是分不开的，所以，华裔社会所面对的问题，也是党的问题，党的利益跟华人群众的利益是两位一体的。在今天这种客观的形势下，民族要有前途，民族的利益必须置于任何阶层的利益之上，因此，所谓华裔社会当然是指包括各阶层在内的华人群众。

所谓在政治上走群众路线，这就是说，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度，以确保民主基本原则的实践，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下级服从上级，上级尊重下级。此外，由于支会及支团是最接近群众的基层组织，所以，我们除了加强支会与支团的组织外，还必须不断地促进支会支团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尤其是跟各阶层华人群众打成一片，这么一来，才能够尽量把华人群众的意见反映给党，同时也向华人群众解释党的立场及政策。

(2) 在经济上走群众路线——因经济上走群众路线就是要维护及促进广大华人群众或整体的经济利益，而不只是促进某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经济利益。我们要确保整个民族的经济前途，提高民族的经济地位，而不只是提高少数人或个人的经济地位，因为马来西亚整个客观局势的发展趋向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民族的经济要有出路，个人的经济才有出路。

党推动组织马华控股公司，以及带动华人群众通过控股公司或合作社的组织，把华人群众的人力、财力、技术及经验汇集起来，走向企业化，以确保民族经济的前途，这就是党在经济上走群众路线的实践。如众周知，设立马化控股公司是党的第一个五大计划之一，而在各州组织控股公司又已经被列入党的第二个五大计划，此外，马华章程的第二章“宗旨及目标”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出来，把“鼓励、建立，并发展合作社

运动”列为党的斗争目标之一，由此可见，党在经济上走群众路线的决心是不可动摇。

(3) 在文化及教育上走群众路线——在党的推动下成立的马化合作社，推行大学贷学金计划，使家境清寒的子弟不致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丧失了深造的机会，这是党在教育方面走群众路线的实践，党认为大专学院不应只为有钱人的子弟而设，教育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之，凡是具备所需资格的青年，不分种族，不分社会地位，都应该受到鼓励与协助入大专学院深造，他们不应由于经济或其他原因而被剥夺了这个机会。其次，如果我们让这种人才埋没的现象继续下去的话，就不但是国家的损失，也是民族的损失。我们这个民族的前途势必因为人才凋零之故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所以，唯有在这一方面走群众路线，才能够达致我们的斗争目标，才能够确保民族未来的幸福。

在国家的教育政策上，党坚持的三个基本原则是：（一）华裔学生必须能够好好地掌握他们的母语母文（即华语华文）；（二）华裔学生必须具备所需的条件，俾能适应马来西亚这个种族多元化社会的生活环境；（三）华裔学生离校后，在就业方面应有合理的把握。关于上述第一个原则，党在各方面大力支持与协助华文小学的发展，以及矢言“与华文小学共存亡”，这都是党在行动上的实践。至于第二及第三个原则，党发起创办拉曼学院，而且鼎力协助该

学院的发展，就是党在实际行动上实践这两个原则的最有力证明。

(4) 党不但要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文化教育上，以及在其他方面坚持走群众路线，就是在华人群众的思想意识上也必须通过宣教的工作让他们抱着“集体努力，集体受恩”的信念。我们应该不断地向华人群众强调，作为一个民族，华人当前面对着最大的考验与挑战，就是扬弃个人主义及自私自利的思想，通过集体的努力与行动，以争取整体的生产与发展。

结论

马华公会在政治斗争方面采取和平、中庸和现实的路线，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致力于争取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在国民团结的问题上，鉴于现阶段的特殊社会、政治结构，我们主张个别种族的非对抗性的团结，通过种族团结来实现国民团结的长远目标。在经济、文教权益地位的维护和争取方面，我们放弃盲目、消极反对和空谈幻想，而主张积极参与和自力更生，发挥自动自发精神，通过短期和长期的自强自救的具体计划，以弥补官方政策的不足。

马华是一个走民族路线和平、中庸，积极进取实事求是的党。

我们要照顾的是华族人民长远性的利益，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子子孙孙未来的幸福，所以，在不损害华族应有权益

的原则下，我们要把华裔同胞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等各领域的努力和活动，导入国家的主流去。我们要说服华人群众：唯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确保华族在马来西亚应有的地位，才能够使我们的子子孙孙的幸福得到保障。我们也要教育及说服华人群众，这样做固然免不了会使华族固有的一些传统与价值观念受到挑战，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华族的基本权益因之受到损害。作为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者，这就是我们斗争的总路向，这就是马华的总路线。

总结一句，我党的总路线是：

- (1) 我们的政治信仰与精神（主义）是服膺于民主、自由、平等。
- (2) 我们通过采取中庸与温和之道展开政治斗争，以达致上述目标。
- (3) 我们致力于民族团结（华人团结）来达致国民团结。
- (4) 我们通过群众路线贯彻党的愿望。
- (5) 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积极进取的态度行事。
- (6) 集体领导、集体负责、相信群众。

立新

前言

每一个政党都有它的斗争目标，为了达致这个目标，它必须遵循一定的斗争路线。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固定的斗争路线，就会像一艘既没有指南针，又不遵守固定航线的船那样随波逐流，随时都有触礁沉没的危险。

所谓“固定的政治路线”，并不是说一个政党的路线一经决定下来就一成不变，不容质疑与更改，而是说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路线不能随意更改。在不同的时期，如果客观实际情况起了根本变化之后，党的政治路线当然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

政治路线是建立在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因此，要了解党的政治路线，首先必须了解党的政治哲学和斗争目标。

马华的政治哲学和斗争目标

马华的政治哲学和斗争目标，可以从马华公会章程第二章“宗旨和目标”中看到，这一章的内容共有十六纲领：

1. 确保和防卫马来西亚之独立及主权。
2. 确保和维护马来西亚宪法。
3. 确保和维护一个以多元种族为基础的国会制度和民主政府。
4. 争取和维护人权之行使，纠正不公平之现象，并扶助贫困之人士。
5. 确保马来西亚宪法内马来西亚华裔人士之合法权利和利益，以及所有其他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获得



马华公会的政治哲学、目标和路线

钟德盛编：《培训手册》，
吉隆坡：马华中央干训局，1993年，9-12页。

承认和保护。

6. 维持、培养和促进马来西亚各种族公民之间之亲善与和谐，以确保一个强大及团结的国家在和平中进步与成长。
7. 以合法及符合宪法之方法，促进、维护，及争取马来西亚华裔人士在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经济与其他方面之利益。
8. 考虑、援助、和处理有关全体党员之各项事宜，并为他们的福利和进展采取所需之步骤。
9. 促进本国经济资源之充份发展利用，以造惠本国全体公民。
10. 促使本国全体公民获得充份与平等就业机会。
11. 加强与改善国家生产力，以提升高度之生活水准。
12. 加强和维持我国每一位公民的社会正义、经济保障及平等机会。

13. 鼓励、建立和发展合作运动。
14. 与马来西亚境内注册且具有与本党相同宗旨和目标之其他政治团体共同工作，以促进政党政治之健全发展。
15. 保存与维持华语、华文之应用与学习，并确保它在马来西亚宪法152条明文规定之应用、教授及学习不会被禁止和阻挠。
16. 进行以上各条款以外之事项，以谋求本党和党员之一般利益。

从上面十六项纲领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五项党的政治哲学和斗争总目标：

1 捍卫民主自由

马来西亚是个民主国家，马华公会是个民主政党，我们服膺于民主自由的理想。由于我们信奉民主自由的政治哲学，所以我们不惜代价维护我国的国会民主制度，遵循宪法，崇尚法治，保障人权，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极权统治，我们抗拒一切形式的过激与极端主义思想。

我们谴责一切非民主的暴烈的处事方法，而崇尚协商的民主精神，主张以折衷调和、互相迁就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正因如此，在我国的政治体系中，我们选择了积极和主动参与的路线，通过各民族政治联盟的方式，使华裔公民得以参与每一层次的政府事务。

由于我们信奉民主政治哲学，故我们认为反对党有存在的价值，但是我们

并不同意“为反对而反对”，或纯粹以制造课题，以图自私利益的消极反对的政治作风。

2 争取各族人民平等地位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这是个无可否认和不可改变的事实，基于这项事实，我们主张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上，都应该享有平等地位。每一位公民，不分种族，不分信仰，都应享受公平合理的权益。我们反对厚此薄彼，更不能接受一族支配另一族。我们坚决抗拒种族主义和种族霸权主义，我们致力于实现一个各民族人民一视同仁的大同邦国的崇高理想。

3 伸张社会正义

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们反对人压迫人，人剥削人。我们为各种族、各阶层人民争取公正合理的待遇，我们致力于纠正一切不公正的现象。我们认为应该不分种族、不分信仰地扶助贫弱人士。

4 促进种族和谐与国民融合

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国家，马来西亚的前途乃系于各种族之间的融合和睦与团结合作，因此我们坚决抗拒沙文主义，致力于消除种族偏见，促进种族谅解、亲善、团结与合作。

我们反对同化，主张基于各族平等的原则，缔造国民团结和融合。我们全力支持缔造国民团结和国民融合的一切

努力，与此同时，我们也致力于促进华人社会内部的团结，我们认为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中，族群的团结仍然是必要的，而且十分重要的，各种族的团结跟国民的团结并不互相矛盾，相反的，促进国民团结和族群团结的努力，可以并行不悖相辅而成。

通过个别种族的团结，来维持各族之间的政治权力的公平合理分配，是现阶段我国政治稳定的必要步骤。因为在某个种族团结一致，政治力量高度集中，而另一个种族四分五裂，政治力量高度分散的情势之下，极端种族主义就很容易抬头，其结果就是种族情绪高涨，国家政治稳定受到威胁，真正的国民团结与融合根本无法实现。

由于我们主张民族平等，国民融合，所以在文化上，我们主张促进各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以便基于各种族都能接受的共同价值观，来塑造充分反映多元种族特徵的国家文化。

我们坚信文化分殊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不但无损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进步，反而能使马来西亚文化丰富多采，生机勃勃。

为了确保种族和谐与国民融合，在宗教上，我们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并致力于促进不同宗教集团之间的谅解和容忍，我们坚决抗拒宗教狂热主义和极端主义，反对将某一宗教特有而不能为其他宗教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或信仰，强加予其他宗教信徒或非信徒身上。

在语文和教育上，我们基于基本人权的原则，主张各民族应有保留、使

用、学习和教授母语母文和自由选择子女教育源流的权利。在不影响国民团结和国语地位的大前提下，各民族维护和发扬其母语教育的努力不应受到阻挠，相反的，应该受到尊重和鼓励。

5 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

基本上，我们信奉自由企业制度，主张各种族、各阶层人民都享有自由选择参与任何经济活动领域的公平合理机会。我们认为政府不应过度的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与民争利。我们也反对以太多的严峻的法令规章，尤其是消极和箝制性的立法及行政规划来阻挠国家经济的成长。

由于我们伸张社会正义，因此，我们并不反对旨在扶助贫弱落后者的政策的措施，但我们认为一切扶助贫弱者的措施，都应该使每一个种族人民受惠，同时，这些措施应以不妨碍国家经济的成长为前提，我们确信唯有一个迅速成长的经济中，种族和区域间的经济不均衡现象才能获得匡正。我们也坚决认为，一切纠正经济不均衡的政策、措施，都不应损及任何种族或集团既有的权益，和危害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马华的斗争路线

认清了我党的斗争目标，以及考虑到我国的多元种族社会结构与政治现实之后，我们为实现上述目标所应采的斗争路线和策略也就显而易见了。

1 和平、稳健

因为我们服膺于民主自由的理想，我们无可选择的必须采取和平、稳健的宪制斗争路线。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形式和性质的偏激思想、极端主义以及暴烈的斗争手段。我们在争取民族的合法及合理权益方面，主张采取和平协商的手段，基于互相谅解，互相忍让，互相尊重和互惠互利的原则，来达致彼此都能接受的协议。我们充分了解到，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没有任何一个种族可以不顾其他种族的感受，为所欲为，一百巴仙实现其愿望或满足其要求。

2 群众路线

民主政治的特点是民众的广泛参与，一切的政治决定，都必须以大多数民众的愿望为归依。因此，我党必须开放门户，走群众路线，这意味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在组织上，我们的党领导层是由广大基层通过民主的选举推选出来，因此，领导层不能独断独行，违背基层的意愿，在政治斗争方面，我党的重大决策，都应预先广泛征询基层及民众的意见，然后拟定和施行。

马华公会虽然宣称代表马来西亚华裔公民，但绝不意味着凡是与华社权益有关的事务，都全由马华“包办”。正因为认识到这个事实，我们遵循群众路线，基于求同存异的原则，加强我党与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以便尽量发挥群众的力量，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集思广益，并肩奋斗。

3 集体领导

我党贯彻集体领导体制，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我党拥有一个健全的党委会的制度，足以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和包办。经过一九八六年修改后的我党章程，更具民主精神，进一步巩固了集体的体制。凡是牵涉到党的路线、政策、方针和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中央委员会集体讨论后作出决定。我们不搞家长制，也避免官僚作风，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我们依靠集体的经验、智慧和力量，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民主原则行事，以确保我党的政策方针得以正确有效地执行。

4 务实主义

我党在处理党内、外的事务，尤其是有有关国家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方面，采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注重行动，讲求实效务实主义路线。我们反对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不崇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空洞理论，避免浮夸虚饰的作风。在长期的复杂曲折的政治斗争中，在不损及广大人民群众根本的整体利益的原则下，我党尽量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和手法来实现既定的目标。我们既有长远的计划，和远大的理想目标，也注重短期的工作，重视一点一滴的建设成效。我们主张积极进取，但是反对不顾客观实际情况，单凭主观愿望采取盲目行动的冒险主义。

马华公会应否改变它的“单族政党”特征，蜕变为“多元种族政党”？这是目前的热门课题！这课题的被提出及受热烈讨论，导源于马华在1986年的全国普选中，遭遇惨重挫折及随后发生的一连串种族性大争论。

对马华来说，采取“多元种族政治路线”并不是争论问题，因为马华党章明文列出的16条“宗旨”中除6.5节及6.15节外，几乎100%符合“多元种族政治”的精神。不过要马华改变成为“多元种族政党”就不是一项简单的问题，因为马华由成立至今，都是以“华人单族政党”的角色存在我国政坛上。即使在1969年，马华在全国普选中一败涂地后推出当时执政的联盟内阁，马华也并未改变它的“单族政党”的特征。

因为，紧接着马华于当年5月13日议决退出内阁后，当天下午便发生了血腥的“五一三种族流血冲突”事件。

这个事件强烈显示，内阁中不能没有马华这个“华族政党”。於是，在敦拉萨的殷勤促请下，在华社各界的再三呼吁和主要团体盖章签名支持下，马华终于以“国家利益及华人前途为重”的理由，於5月20日重返内阁，继续扮演“代表华人”与他族谈判协商的“华族政党”角色。

就算74年联盟扩大成为国阵，容纳其他“多元种族政党”加入时，马华也是在确定了它的“代表华人”地位之后，才同意成为国阵成员党的，因此，它仍然是个“华族政党”！

今年全国普选，马华是第4度在国



马华该走何种斗争路线？

张文欢著，张景云主编：《当代马华文存1——政治卷（80年代）》，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2001年，235-246页。

阵旗帜下竞选。

结果，在参选的32席中，只取得17席，而它的主要对手民主行动党则获得24席（包括沙、砂的5席），这显示：华人选民中，有相当大数目拒绝支持马华“代表华人”。

不过，在州议席选举中，依靠3大种族选民的支持（在部份国会选区中也是如此），马华仍然赢得比民主行动党较多的席位（马华43席，民行37席）。

历史是决定性因素

综上所述，可见马华作为一个“单族政党”是决定于历史的因素与环境的需要，而在1986年普选中出现的现象，隐伏着“马华应否改变为多元种族政党？”的疑问。不过，假如不是随后发生的一连串种族性大争论，相信这个问题还不至于像目前这样受到热烈的关注

和讨论。

所谓“一连串种族性大争论”，有略加评述的必要。

事缘巫统在本届大选中，拜华社某些团体与回教党亲近，引起马来选民对回教党产生疑忌之赐，取得辉煌的战果之后，志得意满，认为它的种族政治路线是获得支持的保证，因此刻意突出它的种族利益的政治路线。结果，在政、经、文教领域，便出现对华人非常不利的现象。阿都拉阿末的“玩火论”燃起极端种族主义的火花，安华依不拉欣教育部长不愿履行大选前许下的，修改教育法令的诺言，而且一改其以往的“较温和”的形象，不断发表偏激的种族性言论，加剧了种族两极化的趋势。

与此同时，马华领袖之一的李金狮，在接受巫文报章的访问时，评述了马华在本届普选失利的因素。他坦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方式不当以及执行上出现诸多偏差，是造成城市华人不满意政府的关键性因素，并连累身为国阵成员党的马华受挫！

此项谈话，旨在指出“施行方式”与“行政”方面的缺点，但却被歪曲引述，变成指责“新经济政策”和它的“消除贫穷，重组社会”目标。於是，由马来人传播媒介开始，迅速蔓延到马来人文化、教育、商业、宗教等团体，众口一声，指责李金狮违反国阵精神，“反对新经济政策”，大加声讨，几乎把李金狮当成箭靶。

到了9月，巫青，巫统大会期间，马来人的种族主义言论一发不可收拾，

“外来移民”被公开提出，“叛徒”、“新罪犯”的帽子满天飞，连身为领袖者也加入贬谪马华及李金狮的行列，指马华依靠马来人的支持才能中选，却“反对”新经济政策，是“忘恩负义”的行为等等！

过后，雪州马华代表大会通过“没有土生民族”议案还以颜色时，种族间的紧张局势达到危险的地步，46名巫统后座议员集体施压要求首相撤出李金狮的部长职位，要求雪州苏丹取消李金狮的“拿督”封衔。一些巫统和马来团体发动示威，声讨马华及李金狮，而巫统控制的巫文报，则每天以大幅标题推波助澜。但马华方面也一样强硬，总会长林良实明白表示：马华决与李金狮共进退！

后来，内阁鉴於局势的严重性，快刀乱斩麻，硬把有关课题压下去，不准再称呼华印公民为“外来移民”，马华也就把“没有土生民族”的议案收回。

经过这场风暴之后，马华党内一些人认为，国阵中“华巫印联盟”的精神已丧失。特别是马华在本届大选所获得的支持力量明显衰退之后，马华已失去国阵种族政治结构中的“制衡”作用。马华代表华人与他族谈判协商的地位已被贬到比国大党还低。因此，继续坚持以“华族政党”的地位在目前国阵结构中，只有继续对巫统有利，继续吃亏罢了！

他们说，这1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在国阵种族政治结构中，巫统政治领袖利用“支配性种族”的地位，依赖其族

群的人口优势，随心所欲挑起种族气氛，去达到其“支配”他族目的，马华若坚持继续以“一个种族代表对另一个种族代表”的政治斗争，由於客观条件和权势的悬殊，肯定无法实现华人的全部意愿，无法满足华社的需求，只有吃亏和继续背负更多的政治包袱，陷於难以自拔的泥沼。

在党外，具有以上看法的人士也正在热烈地讨论着。继2名马华中央代笔在本届马华代表大会正式表达了“马华应改为多元种族政党”的言论后，一贯主张华社应进行多元种族政治斗争的前《南洋商报》总编辑朱自存先生先后发表了两篇讨论马华应否继续号称“华族政党”的鸿文。苦口婆心地劝谏马华，不应再干“以一个种族代表对另一个种族代表”的傻事，去搞吃力不讨好的单元种族政治！

朱先生认为，马华的种族政治斗争是“艰苦”的。

他在评述了此次马华与巫统之间为“外来移民”与“土生民族”问题的争执，以及马华遭受巫统后座议员“46人”帮的强大压力与艰苦斗争之后，提出了一项苦涩的，值得马华上下，华社各阶层有识之士再三咀嚼、深思、警惕的意见。

他说：“马华如果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它所代表的华族，能够当得上几多次的‘成仁’？”

是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操守，“不成功便成仁”的气节，是华族传统所钦仰的。文信国公文天祥之所

以获得后世的孺慕，便是因为他具有“不成功便成仁”的“烈士”气概。

华社多数人，敬爱“烈士型”政党和政治领袖。马华之所以受尽一些人（特别是斗士们）的非议，正是因为马华没有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态度去进行“烈士型”政治斗争；但，正如朱自存先生所独特指出的：马华如果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它所代表的华族，能当得上几多次的“成仁”呢？

因此，朱先生强调：“马华公会应觉醒，把自己蜕变为多元种族政党，以争取全民利益来保护华人利益。”他说：“当全民（各种族）利益确保的时候，大家不分彼此的一样有好处。”

笔者100%支持朱先生的主张——如果，能够“以争取全民”利益来保护华人利益。如果，“当全民利益确保的时候”，能够“大家不分彼此的一样有好处”！

太美了！太好了！这确然是身为“非支配性种族”所追求的，憧憬的“理想”！

客观存在决定斗争

但，问题是：我们的客观存在，有没有实现这个“理想”的基础？或者说：在可预见的岁月里，有没有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

同时，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与我国的多元种族结构性质相同的国家，已达到了这个“理想”，可以让我

们“借鉴”？有没有一套得到“实践的检验”的理论，足以指导我们“以争取全民利益来保护华人利益”？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准备调整自己，放弃自己的某些特征，去符合“全民利益”的要求？

譬如：为了“全民利益”，我们需要一项共同的语文。因此，在一个多元种族政党的集会上，我们必须放弃讲华语，而使用一种“共同语”。试想，我们能接受吗？（假如用英语作为“共同语”，一些崇洋的“假洋鬼子”必然乐意接受，但如此一来，华族尊严何在？他族又能接受吗？）

这就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现实”！而这样的“现实”却又是那么多，那么明显！那么地难以解决！

此外，我国的种族和人口结构，种族的文化背景。宗教和习俗的差异，也是很特殊的！特殊到在这个世界上难以找到几个相同的例子。

国情特殊没有前例

其特殊处，荦荦大者有下列几项：

1 种族和人口结构

我国是个多元种族国家，但和其他地方的情形不同。

一般的多元种族国家，其“支配性种族”，是占“绝对优势的种族”，如中国的汉族（90多%）泰国的泰族（81%）甚至印尼的爪哇族（只占42%，但是该国的少数民族的人口都介

於2到3%之间，唯一最大的少数民族“巽他族”也只是13.6%，华族则仅有2.9%）……，在人口结构上，都占着压倒性的多数，绝对不必担心“非支配性种族”会威胁到支配性种族的地位。因此，支配性种族乐得采取“宽大”的种族政策，至少，在表面上“善待”少数民族！

但是，居我国支配性种族的马来族，虽然占47.2%，其他非支配性种族却不是“绝对少数种族”（不同於印尼的少数种族），单单华族就有33.3%，加上淡米尔族的8.7%及其他种族10.8%，总数凌驾於支配种族之上。因此，支配性种族就不免战战兢兢，疑神疑鬼，采取种种具有限制性的步骤，去堵截和防患非支配性种族的发展和壮大，并殚精竭虑，刻意去削弱，消除其特征。

另一方面，我国的支配性种族，在人口结构上既然超越其他个别种族；那么，在行使“支配性”权势时，它又不像殖民地宗主国或南非共和国那样，显得“名不正言不顺”以及被指责为“少数统治多数”！

在理论上，我国的支配性种族，大可以“理直气壮”及“理所当然”的姿态，要求非支配性种族认同支配性种族的语文、教育、宗教以及风俗习惯等文化特征。

2 文化背景的差异

构成我国多元种族社会的支配性和非支配性三个主要种族的文化背景，没

有任何共同点，这也异于其他多种族国家。

一般来说，我国支配性种族的历史比较短浅，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相当贫乏（必须指出：贫乏不是罪过。）而非支配性种族的历史则较悠久，并有光辉灿烂的文化渊源（也所以有些侨民意识浓厚的斗士们整天发着褪了色的“天朝荣光”的梦幻。）。对比之下，非支配性种族多多少少心里有些儿优越感，并执着于本身的文化传统——这是自然的现象，但不幸这也造成支配性种族的恐惧感，担心一旦采取文化开放的政策，本身将相形见绌。

另一方面，当支配性种族运用政治优势，通过国家机器，意图以支配性种族的特征去取代非支配性种族的特征时，则受到非支配性种族有形的或无形的但却很坚决，很激烈的抗拒，加剧了种族间的矛盾。

3 宗教和习俗格格不入

宗教和习俗是文化表现形式的一部分。相对于文化背景和总的差异，各族宗教和习俗的差异在我国，较之其他文化层次的差异更加尖锐和难于调和。

回教是我国支配性种族虔诚信奉的宗教，戒条和约束力严峻，影响所及其风俗习惯也非常严谨——这种严谨的习俗，即使是在最普遍的，和属于文化最底层次的饮食方式和习惯，也表现得非常突出而导致与其他非支配性种族之间，格格不入——最明显的例子就出现在学校中。学校应该是培养和谐、团

结、爱心的场所，但是，由于宗教的关系，回教徒学生却被教导回避与非回教徒一起用膳。

有人认为：我国各族文化互相融化或同化的主要障碍，来自宗教和习俗的歧异，有其一定的道理。

以上各点已经有力地突出了我国多元种族的特殊性。

外国情况不合大马

特俗的情况，必须以特殊的方法去处理。符合其他国家采行的多元种族政治斗争路线，未必符合我国多元种族的特殊情况。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表面的“多元种族”形态，而对我国“多元种族”的特殊情况和特殊性缺乏理性的认识，硬把其他国家的多元种族政治斗争的路线，套用到我国来，就难免患上“教条主义”的错误，导致失败。

政治是经济基础的集中表现；政党是代表某社会阶层或集团的利益的组织。从事“阶级斗争”的政党迷信：当阶级利益得到确保时，种族利益一样得到确保。但是，证之历史，证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这项理论虽不能说已告破产，但缺乏说服力已是肯定的。

再证之我国过去的左派政党的兴亡史，这项理论根本就不符合我国的客观现实。

在我国，相对于种族利益，阶级利益已退居次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实力强大，组织严密，从事阶级斗争的前社阵，劳工党竟会被一个标榜“民主社会

主义”，实际上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仅仅以突发课题作为斗争内容；仅仅依靠少数寡头领袖搞种族情绪去哗众取宠的民主行动党所取代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在我国，主张多元种族政治斗争，不是新鲜的理论。除了上述左派政党外，早在独立前，马来族的先知先觉政治领袖拿督翁，就已提倡在先，左倾的马来人政治工作者，伊沙及波士打曼等也是多元种族政治斗争的信仰者。在华族方面，马华创始人陈祯禄也一度支持多元种族政党（独立党）的多元种族政治路线，林苍佑也组织过多元种族的民联党。这些人如果不是打回单元种族政治的原形，就是以失败告终。

政党须靠单族支持

今天，在我国，仍不乏多元种族政党，东马的人民党、团结党、人联党，西马的民政党、人社党、社民党、民主行动党、国民团结党……，都是标榜多元种族的政治组织，但是，其支持力量，仍然来自单元种族方面。其中人社党是以马来人为主的多元种族政党，而且标榜为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真正“社会主义”公平社会而斗争，但是，别说屡次在大选中因未获三大种族支持而失败，就说它的党员结构吧，有多少巴仙华人和印度人？实质上，它仍然没有摆脱作为一个马来人单元种族政党的实质。

至于其他以华人为主的多元种族政党如：在朝的民政党、进步党和在野的

行动党、社民党等，虽然标榜多元种族，虽然采用“英语”或“巫语”作为它们的会议的“共同语文”；但是，谁都知道，马来人并不支持它们，它们的马来人党员人数少得可怜，几乎不上1%，即使印度人，也只是点缀品。而它们也不能、不想、不敢到马来人地区去展开政治宣传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去争取马来人支持他们所标榜的多元政治。

放弃马来人去谈“多元种族”政治，岂不等于空谈？而空谈又如何能缔造“全民利益”呢？既然没有能力缔造“全民利益”，所谓“当全民利益确保的时候，大家不分彼此的一样有好处”云云，岂不变成望梅止渴？岂不变成纸上画出来的“烧饼”，只能看，不能充饥？

而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多元种族”政党的政治纪录来看：它们的所谓多元种族政治斗争，很多时候竟比“单元种族政党”更“单元种族”化——特别是处在反对党地位的所谓“多元种族政党”，如民主行动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以煽动华人的情绪，制造种族敌视，以臭骂他人是：“马来人的走狗”的偏激种族主义手段去分化华人，然后博取部份被分化出来的华人的支持。

试问：这样的“多元种族政党”，如何能赢得全民（各种族）的共同支持？如何能执掌政权，造福全民？

总结

前文提到，我国各族在人口、文化、宗教及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和“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我国的“种族政治结构”，华、巫、印三个主要种族，通过各自的“单族政党”，在内阁和会议桌上谈判协商，分配权力及各族的利益，避免了存在着各种差异的支配性种族和非支配性种族之间直接竞争所必然产生的磨擦，使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建设，持续多年。

在现阶段，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也未有任何保证：代表支配性种族的巫统，会放弃“种族政党”的角色。如果马华此时单独放弃代表华人在国阵种族政治结构中制衡巫统，势将出现下列后果：

加强内阁制衡力量

(1) “政治权利”将不受限制地集中到巫统手中。

而权力集中的危险是：腐化将随之而来，因为，权力往往掩盖当权者的眼睛——如果没有适当的制衡。

(2) 非支配性种族丧失“分享政权”的机会，结果种族权益没有代表保障，只能任由摆布。

(3) 支配性种族将在“全民利益”的名义下，立法及通过国家机器，强制非支配性种族放弃其种族特征，一如印尼所施行者，以加强同化非支配性种族的步伐。

(4) 非支配性种族由于没有一个适当的场所（如内阁）供讨价还价，而在一人一票的政治斗争中又限于人口的因素，很难去实现本族的要求和目标。最终，当一次又一次失败后，可能采取宪制手段以外的激烈斗争方式。到时，会发生什么事？会出现什么后果？

印度的锡克族，斯里兰卡淡米尔族人走过的血腥之路，我们是否准备步上去？动乱、流血……生命何价？权益和地位又能得到保障、改善吗？

在目前的形势下，花费精力去探讨马华应否蜕变为“多元种族政党”，倒不如集中精力去探讨如何加强马华的政治力量，加强马华在内阁的制衡作用。

从马华在内阁所分配到席位和权力来看，三个主要种族分享政权的联盟精神并未完全消失，马华作为代表华人的“华族政党”，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马华需要华族配合

问题是，马华在政府中的部长、副部长、政务次长，甚至他们的政治秘书、机要秘书，有没有严格地对待自己、要求自己、时时刻刻学习、进修、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智识、能力（包括语文的表达能力）思考力……等等。

这是很重要的，马华在政府中的代表必须不断提高个别的和集体的素质，表现其能力，才会得到他族的尊敬。而只有在受人尊敬的情况下，他们才有机会掌握权力，发挥最大的作用，去履行代表族群的任务。

但是，一只手拍不响，马华的努力还须华社的配合，才能加强在内阁的制衡作用。

只打不教非关心也

马华基层埋怨，华社，特别是活跃的少数对马华的态度是：“只取不帮”、“只骂不管”、“只打不教”，或者把马华当成发泄闷气的沙包，生气时就去打它踢它，过后连看都不去看他一眼。

这是由于大家对马华缺少一种认同的结果，其实，当我们了解了我国的特殊国情需要马华代表族群去制衡他族的

权利，以免国家的政治“出轨”之后，华社为什么不能改变以往的态度，把马华当成自己的家，马华的30万党员（说50万可能夸大了点），和你我一样，同文同种，体内流转着同样的血液，华社应该把他们当成至亲的兄弟姐妹，给他们一点爱心。马华有错，责备它，但不要丑化它，打它，但不要毁灭它。关心它、教导它、扶持它、参与它，付出一点心、一分力、一滴汗去加强它，使它能够完成它的任务，不是更好吗？毕竟，你是华人，我是华人，他是华人，而马华就是你、我、他的代表。

《马来亚通报》 / 1987年1月1日

立新

要寻索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思潮，保守主义往往是受人轻忽的一个支流。它与自由主义在这个国度的命运雷同，虽然似有若无，但影响多少存在。如何重新发掘它的脉络与系谱，关系到华人政治史书写中，一段未受重视却值得填补的思潮空白。我认为，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政治思潮里，是有一段微弱的保守主义传统，它过去曾经起了一定作用，却后续无力，如今更是凋谢褪色。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一词，一直在汉语世界中受到污名对待，它背负了贬义或负面的意味，保守似乎就隐含了僵固、反动、封建、抗拒变革的联想，从来都不算是正面的，这造成汉语使用者无法对保守主义有长期的“好感”。比起左翼思潮或民族主义的大旗，保守主义在中国近代史及深受这种“中国性”影响的新马华人政治中，都未能取得道德上的优势与制高点。虽然它的种子在不同的年代，都以各式各样的面貌存在著和发挥著角色。

保守主义要“保守”什么？

但是，在西方世界，保守主义却是一套确有所指并有所依循的政治价值，自然也是西方历史演进下的产物。不过，它可否称得上一门政治意识形态，仍有不少争议。如果意识形态正如狄崔西（Destutt de Tracy）所言，是一套“观念的科学”（science of ideas），



没有“主义”的保守

潘永强著，潘永强、魏月萍主编：《华人政治思潮》，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3年，49-58页。

可以提供对现有秩序的一种解释，以及对未来追求的理想世界提出蓝图与模式，则保守主义显然不如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那么的严谨、系统性和富哲学旨趣。但作为一种“心灵态度”、生活取向或行动信念，它无疑影响了西方近代的思潮与社会发展，成为当代西方的传统支柱之一。

究其实，保守主义所标举的价值，在西方历史上存在已久，但直到1830年代才成英国政治话题的一个部分，其实保守主义的哲学在1790年就由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在《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书中体现出来了。因此，柏克亦被视为英美传统下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思想史上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激烈狂暴和极端的自由，及其产生的暴力专政，作出猛烈抨击与谴责。

那么，究竟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是什么呢？有人认为，保守主义可视

为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赓续和继承，它同样追求个人自由和维护私有财产，但在工业革命席卷和激狂的欧洲革命风潮里，保守主义乃源自一种对经济和政治现状快速变迁的恐惧，而带出的回应和反弹。

柏克本身并不反对变革，也非抗拒自由，从他同情美国独立战争即可说明一切，他针对的是如法国大革命式的狂风骤雨，最后社会不只得不到真正的自由，反而陷入更极端恐怖的专制暴力中。因而，英美的保守主义要“保”的，实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免于恐惧的自由尊严，及其主张与价值。

在这种渊源下，保守主义的核心观念就是渴望保持现状，柏克提出“变革是为了保存”（charge in order to conserve）的说法，这与他肯定传统的优点、尊重习惯和历史的观念紧密相关。他认为传统有促进稳定作用，给人一种历史的归属感。因此，保守主义反对抽象的思想和原理，而偏重实用主义，它以为人的能力和理性有其局限，所以从不信任人们凭空想象而提出对未来社会的指导蓝图，因为世界有其复杂性，并非凭思想家的抽象提法即可预见，反而经验和现有秩序更为熟悉和值得依赖。英美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的争论从不尖锐，大可是受这种保守主义的传统遗绪影响有关。

保守主义求助传统，但不是每件留

传下来的事物都值得保存，除了有益，本身也要适合现状。保守主义有一句名言，“当事情不必要去改变时，不去改变它就是必要的。”延伸下去，就是“如果没有损坏，就不必去修补。”这些说法，不是固执地抗拒变迁，而是反对刻意和过度求变，最终反而典当了自由与稳定。所以，当柏克说，“一个缺乏某种改变手段的国家，也就缺乏保存其自身的手段。”人们是不会怀疑其诚意的。

沿着这样的思路，保守主义就不同意历史是进步向前的，它对未来就显得谨慎和妥协，而调和与节制社会的冲突，就无可避免也无比重要。它尊重阶级的排列和权威，认为是现存秩序和社会纽带的一部分，真正的平等不可能到来，反而对自由带来更大伤害。

但是，保守主义承认明文的法律有消除不平等的潜力，它也尊重道德和宗教的作用，至于维护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则是保守主义不言自明的信条了。此外，这个阵营主张代议政制和立宪政体，强调温和渐进的改良而非革命，才是保障自由与民主的最佳途径。

“保守”还是“保守主义”

当我们简略地理解到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容或发现它并非汉语字面上仅有的落后、顽固意涵，反而保守主义本

身有它丰富的内涵和义理。它在政治光谱上，因不偏向激烈改变社会现状，而位居右翼行列，但绝不等同于反动、威权和倒退的意象。英美政治中，保守主义阵营就是一大流派，过去英国执政党就是保守党。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则是新保守主义的风云人物。

与封建、专权和反民主这类概念等同的，应是中文里的“保守”，而不是西方思想中的“保守主义”，我们必须严谨地区分何者是保守主义，而何者则是没有主义、不成主义的“保守”。

那么，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及其思潮演变，有没有流露出保守主义的传统与遗迹？尽管微弱和模糊，我们认为二战前后的英殖民政治遗产，还是为本土留下了林文庆、陈祯禄和陈修信这支华人保守主义的思潮系谱。它曾经壮大，成为中流砥柱，发生影响，最后却无疾而终。

在新马华人政治社会史上，林文庆或可称为保守主义的第一人。林文庆一生游走在中、英和新加坡三地，但贯穿终生的则是保守主义思想。他在英国殖民社会阶级层次分明的环境中成长，却透过个人奋发而向上流动，令他对既存社会秩序寄以尊重和合理化。由此，他投身的社会服务和鼓吹改革，只是停留在习俗、礼仪、教育和宗教上的改良，而非对体制作出挑战或颠覆。林文庆尊崇传统和历史的存续，体现的是不偏激

的民族主义。他关心社会和政治，是一种绅士式的菁英情怀，但他始终温和容忍，重实践而轻抽象义理，在五四后的年代主张儒教而显得不合时宜，正表明他有一种对秩序和伦理的温情与坚持。

政治上，林文庆认同民主思想和自由观念，但始终认定温和渐进的改良方式是最佳途径，不得已时才用革命，他反对激进的社会主义。义和团革命时，他要求列强协助光复，是要中国避免一场大革命灾难，还以法国大革命论证革命所得不多。其次，他主张立宪和改良，早年支持康有为正是为了维新而非激烈变革，后来转向孙中山和革命派，看似摇摆，实则是柏克“变革是为了保存”的体现，因为革命派给他立宪和代议政治的希望。后来袁世凯夺权专政，他才扬长而去。林文庆回归传统，但不是辜鸿铭式的古肃，他依时并进，愿意在体制中参与议政，努力付出，是新马华人政治中第一位发挥影响和典范意义的保守主义者。

艰难的保守主义

接下来是战后有所作为的陈祯禄。陈氏具有保守主义者的大度和雍容，善于协调和调节冲突。早年的政治生涯虽然定向不同，游移在左翼和拿督翁之间，但他坚持马来亚独立建国及各族共荣，认同本土，最终同意与马来保守主

义的代表东姑阿都拉曼结盟。陈祯禄温和、反共及不激进的保守作风，让他取得英殖民政府认同，组织马华公会。马华初创时，集结了马来西亚华人政治上的保守、右翼与民族主义人士，适足以抗衡左翼势力。他认同华文学习，表面上又心向中华文化和传统价值，赢得当时华教人士接受。无论是权贵背景或阶级身分，他在当时都发挥了保守主义者的中庸作用。

政治取向上，陈祯禄谨慎和妥协，进退得宜，深谙英式菁英政治的身段与艺术。他了解到多元种族争取建国，应有所取亦有所退让，不坚持己见，以保留协商空间，在不同利益集团中必有取舍。但是，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一直是他在意的，以保障最终的自由。陈祯禄谦谦君子，私心不重，经常要求各族容忍与团结，不过，他也强调现状必须受到尊重，不容轻易破坏，在自由经济的和谐秩序上，就是他不易妥协之处，至于社会平等和族群的诉求，则不是他所能承诺了。他处身在族群角力的情境中，有时无法保持英式保守主义某些捍卫自由的价值，却是战后华人政治中少见的有前瞻和视野的领袖，也是摇摆的、艰难的保守主义人物。至今，他留下的言论仍不失现实意义。

陈修信是陈祯禄之子，可能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政治中最后一位保守主义代表，自此就开始失色与式微。陈修信在

华人社会和民族主义者眼中，一直不能享有其父的盛名，他对创办独立大学留下“铁树开花”的批语，更使他在华教史的名声永不超生。但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却被国家尊为爱国元老。陈修信在政治上服膺体制和层级，并维护既存秩序，对制度、权威和领袖忠诚，他相信维持现状是最有利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社会需要，这是他与生俱有的保守政治偏见所致，也是他的阶级属性和菁英心态造成的盲点。

但是，陈修信一生为国却无庸质疑，他是尽责的理财者和行政长才，一身清明节制，温和而易于妥协，却尊重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以确保华商利益为己任，本可为一个无为而治的领导。惜他脱离群众，行动犹豫，又无力无耐心处理复杂的政治冲突，只是坚持一套过时的保守主义政治思维，在国民整合和认同危机的困局下，仍一贯理想地守护著独立契约，毫无应付变革的能力。他是华人政治中最受误解和不被认同的政治人物，实多源于他的判断力和沟通论述力不足。马华公会在其任上由盛转衰，则证明了陈修信不思变迁的老式保守主义，在马来西亚华人政治中宣告退场，并丧失指引前景的解释能力。

保守主义无力创新论述

这一支模糊的保守主义系谱，究竟

在马来西亚华人政治上，留下怎样的影响与贡献，可能值得往后进一步的发掘，但它意义非凡却是肯定的。比起华人思潮中的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阵营，新马华人社会其实亦弥漫在保守主义的价值气氛中。只是，保守主义阵营在行动、实践和动员上，并没有比前两者显得急切和“悲壮”，它们更多是心态与价值上的投射，而非呈现在运动和串连上。在王赓武描述的马来亚华人的三种类型里，细心分析，存有保守主义心态者，其实占了大宗。

陈祯禄以降的保守主义人物及其思考，对马来西亚政治起了几种作用。首先，它许可了华人在建国过程中参与协商与制宪，虽然结果不尽人意，无法符合各流派期待，但它们是唯一受英政府和马来保守主义政客接纳的力量，若没有这股保守主义阵营，华人在宪制里的政治地位与处境如何，尚值得探讨。

其次，以陈祯禄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潮，带领了华人介入建国前后的政治框架内，并从中架构出一个温和、可堪运作的政治秩序，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华人政治参与的机会和命运。他们主张的团结、包容和稳定，取得马来族群的温和势力信任，让自由经济体顺利过渡，代议政制初具形态，协商机制勉强操作。

最后，华人保守主义力量在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思潮分野的年代，起了一

种节制和缓冲的角色，调和了激烈的变革和对秩序的猛进冲撞，从而发挥了抵销混乱的历史作用。问题是，保守势力后来结合反动力量，压制人权和公民自由，这才是它质变的开始和丧失意义的根源。

自陈修信以后，华人政治中的保守主义思潮似已无以为续，无论代表人物和相关论述，均不见后来者。保守主义必须是一套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及伦理关系的主张，而不是个别片段零碎的观念。至今为止，华人政治或学术思想界，都看不见有进一步的发展阐述。

然则，系统的保守主义无力再创论述，但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及相关领域，却不乏保守言论和思维，流露的是“保守性”，而非保守主义所护卫的哲学与价值。我们无以名之，只能将许多反动、反民主、反进步、反自由的粗糙保守言论，姑且称之为“没有主义的保守”。它们之不成其为一套主义，是因为没有核心关怀的价值，缺乏前后一贯的原则，以及未经深思熟虑的论述与判断。英美保守主义还附含一种庄敬、理智的风范，但目下纯粹保守的思维，则大多出于政党人士、反智政客甚至封建落伍的民间华团。

马华公会本是华人政治保守主义思潮最有潜能的阐扬者，它的两任会长都具有保守主义的思维和偏好，马华的

创建也正是为华裔保守主义者立下保护伞，实可为华人政治发挥指导领航，或政策辩论时的参考蓝本。问题关键在于，陈修信之后的马华公会本身就是一具失航迷路的政治怪兽，它不是陷入党争、权争，就是抢夺经济资源，根本无心又无力经营政治论述和发展策略。即使在迷乱中觅得一条出路，竟是寄望于基层政治和对民间的统合收编，或栖身在官僚体系内扮演行政修补角色。

另外，种族政治日益占据舞台，亦导致本土华人保守主义无力回应，失去著力点。这使到保守主义所信奉的理念，在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社会骤然变得不合时宜，不切实际。新经济政策后，残弱的保守主义思潮进一步撤守和

败退，它的精力，只好转而应付种族政治下的对立、交锋和自保。

不过，保守主义的褪色不尽然是结构上的困境，也有思想资源贫乏的因素。英美保守主义所“保守”的，是古典自由主义所维护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价值，一旦转嫁本土，我们马上发现本土保守主义者缺乏深厚的对应条件，以坚持下去。我们既缺少自由主义的传统，自由的价值遗绪本就毫不牢靠，保守主义作为自由传统下的一个分支，就面临贫乏的生存条件。它所要“保”的东西原来并不丰厚，土壤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就难以避免。

立新

2010年对马华公会而言，是高度动员的一年。马华先在年初召开去年顺延的大会，过后又进入3月28日的重选，全党的细胞都被动员起来。而在10月10日举行的年度会员代表大会，对该党而言，很可能是来届全国大选前最后一次党大会，也顺带结束了高度动员、极度疲惫的2010年。

这一次党大会的焦点，有媒体集中在蔡细历担任总会长半年以来，是否有效整合马华党内各派。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失焦的问题。现代政党政治中，任何领导人的权力都是短暂的，都只能依据本身的政治资源，对部分成员施行影响力。胡锦涛不可能整合所有中共派系人物，菅直人也不可能整合败选的小泽一郎。

从林良实、黄家定和翁诗杰的缺席，就可以反映蔡细历政治整合的效果。无论如何，这并非意味着蔡氏的权力不能巩固，因为3月28日重选的最大意义在于，党内权力分布回归实力原则，即有多少实力就拥有多少权力。当年以翁诗杰实力之薄弱，却据有最大权力，正是违背了这项不变的权力铁律，招致最终下台。

自308大选之后，国内所有的政党都面临一个新趋势，就是惟有能带领政党在大选中胜出的党魁，才能称王称霸。未来大马的政党政治必然产生的趋势是，党选的重要性会降低，而大选的领军表现，才是决定党领袖去留的最终



马华应朝理性的保守政党转型

潘永强著：《我们的时代精神》，
吉隆坡：燧人氏事业，2011年，184-187页。

因素。巫统不能幸免，马华也不能绕过这个趋势。

只懂在党内买票和制造假党员的人物，如果通不过大选的民意考验，一样要下台；就这个角度而言，黄家定和黄家泉都是上一个时代的旧政客，永远不可能翻身。

由于选举竞争的日益激烈，过去国阵主要成员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模式已经受到挑战，日后都必须转型成为选举型政客，即以选票极大化作为政党生存的主要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无关政治和逃离政治的行为，不可能在新形势下还有存在价值。蔡细历在半年之内，就先后解决掉“终身学习运动”和脱售南洋报业股权，一来是要斩断黄家定留下的包袱和余孽，二来也是要把政党摆放回准备作战的战斗型位置。

可是，纵然“高调问政”和“网络写手”是当前马华公会应对来届大选的

策略，但充其量只是选举技俩，既不是政策主张，也缺乏实质内容，更无关政党转型。一个面临生存压力的政党，若要成功转型，或重新呼唤支持者的热情，就必须要有感动人心的改变，而非纯粹选战策略上的调整。

就此而言，蔡细历其实错失了一个机会。当马华脱售南洋报业股权时，蔡细历没有把握机会，就马华过去所犯的过错做出道歉，或就未来该党的媒体政策作出重大宣示，反而高傲地摆出毫无歉意的姿态。社会无法在蔡细历脱售南洋股权的举动中，看到旧马华和新马华的分别；易言之，蔡细历并没有通过脱售南洋报业为自己加分。

改革不可能没有阵痛，天下也没有无痛苦的转型。无论国阵继续掌权，或是失去政权，马华公会仍然还会在马来西亚政治上有一席之地；随着民政党的即将泡沫化，马华地位也许还会更有份量。为此，马华的政党转型不只是为短暂的选举，也更是为下一阶段的发展生存。

我的看法是，不管在政党属性上、意识形态上，或是在社会基础上，与马华距离较近的定位，是蜕变为一个理性的保守主义政党，提炼出系统和连贯的政策见解，并以日本自民党、英国保守党或香港自由党为参考对象，重新争取传统支持者的信心。

在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中，曾有

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也有微弱的自由主义声音，但占据最大空间的，却是政治保守主义的立场。可是，马来西亚的保守政党却无法发展出有学理份量和政策内涵的保守主义论述，反而让保守政治的形象，与僵固、反动、腐败等同起来。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一词，在汉语世界中承受污名已久，背负了贬义和负面的意味。然而，在西方世界，保守主义却是一套有深厚传统和扎实理论的政治价值，向来受美国共和党和英国保守党所奉崇。

英国18世纪的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就是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公正党的安华也曾引述过他的观点。柏克本身并不反对变革，也非抗拒自由，他同情美国独立战争就可说明这一点。保守主义同样追求个人自由和维护私有财产，它所针对的其实是法国大革命式的狂风骤雨，因为这最后会导致社会不只得不到真正的自由，反而陷入更极端的专制暴力中。

因此，英美保守主义政党所要“保”的，其实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下免于恐惧的自由尊严。保守主义的核心观点就是：“一切变革是为了保存”；他们肯定传统的厚重，尊重习惯和历史，认为传统有促进稳定的作用。

放到现代政治的脉络，保守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大体就是尊重私有财

产、维护工商阶层利益、经济上自由放任、强调家庭和宗教价值，当然也包括尊重权威、强调实用主义、减少社会福利等等。

在马华建党初期，陈祯禄的政治作风，其实就代表了一种保守主义的价值；他强调宪政民主、自由市场、族群和谐，以及不激进的社会改革。可是，陈祯禄以后，华人政治中的保守主义论述没有得到发展，也无以为继，不论代表人物和相关论述，均不见后来者，反而在巫统的种族右翼和在野政党的进步左翼中，进退失据，落后退化。

保守主义必须是一套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及伦理关系的主张，而不是个别片断零碎的观念。我以为，马来西亚华人大部分都是理性的保守主义者，可惜，政治上却没有出现言之成理、思路清晰、理性成熟的保守主

义论述。

面对最低工资、引进外劳、社会福利、财政补贴、医疗改革、语言政策等重大议题，我国的公共政策讨论，除了相对贫乏，就是政治正确当道，很少有理性交锋。最奇怪的是，马华向来代表工商阶层和社会保守群体的利益，但在众多政策讨论上，竟然也提不出扎实、深入、具前瞻性的主张，最后处于捱打，或是失去原来在政治价值上与马华相接近的群体。

马华应该重建它的理性保守主义色彩。该党多年来在意识形态上面临破产，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连保守主义都忘却已久的保守政党。

《独立新闻在线》 / 2010年10月11日

立新



恶水上建桥

MCA in Dire Need of a Rebirth

郑丁贤著：《站在悬崖上——丁贤谈政治》，
雪兰莪：星洲日报，2009年，68-69页。

马华正处在它的低潮期。

我指的，并不只是308大选的失利。

如果只是议席减半的问题，并没有那么棘手悲观；毕竟，过去几十年来，潮起潮落，席多席少；马华大选成绩很烂，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更何况，马华赢得的15个国席和32个州席，并不是那么糟糕，也肯定不会是一个政党的末日。（公正党在2004年只得到一个议席，4年后一跃成为最大反对党，也是议席第二多的政党，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担心的是，马华作为一个政党，逐渐出现空洞化的危机。

空洞化，既是不知为何存在；不知为谁存在；不知如何继续存在。

一个政党的空洞化，绝对比失去议席更严重，也更快造成政党的萎缩。

马华空洞化的危机，在于它没有足够的敏感度，以及充分的反应能力，来面对大马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的转型。

今天的华人社会，和马华想像中的华人社会，有一段距离。

绝大部分华人不住在新村了，他们也不是胶工、工厂员工、杂货店东主；大家不再只是收看绝无仅有，只此一家的电台和电视台，出国最远是到合艾和新加坡。

大专程度的华人愈来愈多，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比例大增；他们早上看报、中午上网、傍晚看电视新闻、晚上再看夜报；一年出国几次，到美国、英国看到西方的民主法制，到台湾看到社会开放下的马英九和陈水扁的较劲。

教育程度提高，生活水平上升，期望往上

攀高，理想更上一层楼；大家的价值观潜移默化，思维大有不同。

他们生活在马来西亚，但是，眼界已经跨越马来西亚；他们已经不是新村村民，而是地球村的居民。

这就是社会转型。

他们不在乎增建几间华小，而是质问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华小；他们不针对固打比例，而是寻求开放、竞争力和高成长；它们不在意肤色和宗教，而追求公平和正义。

这些思维悄悄的产生了，价值观大大的改变了。

而马华还停留在“马华代表华人”、“捍卫华人权益”的口号政治，不知不觉，转型中的社会，已经不再一厢情愿，以种族利益作为单一的诉求。

当马华强调，只要巫统存在，就不能没有马华；现实中，巫统的权力基础已大幅度流失，有朝一日，巫统救不了马华，马华也救不了巫统。

当过去已经不存在，社会已经转型时，马华原有的基础，也已经流失了，空洞了。

今天的大马政治，已经到了一个分水岭，马华的脚下，是波涛汹涌的恶水。

马华的两千多名中央代表，如今的任务是如何在恶水上，建造一道桥梁。

他们必须选出真正有理想和热枕，有远见和愿景，有能力改革的领袖，也要带动马华建立新的政治理念，塑造进步的政治文化，缔造马华的重生。

《星洲日报》 / 2008年10月16日